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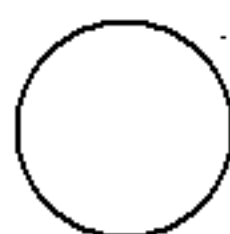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四年 9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九期 目 录

思 想 评 论

- 短评：**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5)
- 坚持革命团结 深入批林批孔**.....齐 力 (8)
-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郭 寰 (11)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方 鐸 (16)
-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梁凌益 (22)
- 李自成起义军对二程的批判**.....钟 宙 (32)
- 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
.....天津第二毛纺织厂党委会 (38)
- 我们是怎么开展批林批孔的**
.....北京市第一一二中学党支部 (42)



劳动人民就该做主人

.....山东邹县野店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郑成礼 (46)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批判林彪反对党领导军队的罪行.....田 军 (49)

儒家的“以礼治军”与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三三二仓库理论小组 (55)

揭穿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某部六连党支部 (59)

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连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63)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湖南岳阳县毛田公社党委会 (67)

执行正确路线 夺取小麦高产

——河南新乡地区的调查报告..... (72)

为革命多出煤.....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党委会 (77)

国际述评：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揭穿苏修所谓“天然盟友”的假面具.....南 景 (82)

☆ 九 月 一 日 出 版 ☆



毛主席语录

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语录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

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



毛主席语录

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语录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思想评论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

(短评)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理论财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并同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认真攻读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党的政治路线的建设，也是同武装斗争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要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联系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路线；要深入清算林彪的错误政治路线，也必须相应地清算其军事路线。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在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他不仅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同时也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能够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他的反动面目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锐利



武器。毛主席在我国革命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对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所作的批判，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林彪或包括批判林彪的错误在内的。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名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地批判了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批判，包含了批判林彪的错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大量论述，包括《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则是对林彪追随王明路线，妄图依靠国民党打正规战的有力批判。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以及当时对这两大战役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更是对林彪顽固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我们的批判就能抓住实质，击中要害，真正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可以同批判孔孟之道紧密结合起来。林彪利用了孔孟之道作为其反动思想武器，我们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可以联系到批判儒家在军事上的种种谬论。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作了大量的论述，许多地方都是对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对孔孟之道那套反动虚伪的仁义道德作了彻底的否定，宣告了什么“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儒家骗人鬼话的破产。毛主席并以宋襄公为例，教育共产党人“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的论述，关于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论述，是对于儒家“以礼治军”的反动纲领的深刻批判。毛主席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了那种认为必须保存反动势力否则就“不合国情”的反动儒家说教。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仁政”观点，指出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只能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决不施仁政。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领会毛主席所深刻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就会更加深刻。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因而它同时也是哲学著作。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但总结了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尤其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同时，又用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



界,指导战争。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就能学到其中包含着的极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懂得如何去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如何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何从实际出发去制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和方法,这是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不能缺少的。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关于从虚心的调查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中采取恰当措施,以掌握主动权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思想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对于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毛主席在提倡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就说过:**“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对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学习得好,就可以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对于做好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对于继续加强军民团结,都将发生很大的作用。广大群众和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用以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已经收到很好的效果,应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也是加强战备的重要措施。

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对历史上战争的性质、军事的规律、战略战术原则的运用等等作了大量的论述,为我们研究各种不同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充分的依据。毛主席对于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许多优秀的范例。例如,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毛主席就肯定了实行法家路线的军事学家孙武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认为它到今天**“仍是科学的真理”**,并以此批评那种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人,认为他们都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科学地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出发,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创造和发展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号召全党**“注意研究军事问题”**。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一次对军事问题的深刻研究。我们必须把学习、批判和总结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使批判更加深入,在批判中更好地学习,同时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现在的新鲜经验,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坚持革命团结 深入批林批孔

齐 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革命团结，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标志之一。

革命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政策，可以而且必须团结绝大多数人，包括团结自己的阶级，团结自己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革命的团结，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战斗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坚持了这个原则，并进一步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主席多次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我党五十多年的斗争历史表明：只有团结，革命事业才能前进，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在旧社会，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千疮百孔，民族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工农联盟，紧密地团结了各民族广大人民，共同对敌，驱逐了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又领导全



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粉碎了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粉碎了他们颠覆、侵略、分裂我国的罪恶阴谋。尤其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伟大指示，团结起来，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彻底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实行了革命的大团结。

“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我们党总是把团结大多数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把坚持团结作为胜利旗帜和战斗口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而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他们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无不如此。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搜罗一小撮牛鬼蛇神，拼凑反革命小集团，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拉山头，结死党。在这方面，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充分的表演。他同刘少奇一样，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和“以我划线”的反动政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地下黑司令部，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分裂我们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正因为这样，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必然遭到彻底的破产。

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破坏革命运动。林彪反党集团就是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早已垮台，我们要把维护革命团结当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项重要历史经验，在批林批孔中自觉地加以注意。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批林，不批孔，制造谣言，散布小道消息，以此来转移斗争大方向。对于阶级敌人搞分裂



的阴谋活动，我们必须给予彻底揭露和打击。

斗争需要团结，团结进行战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斗争锋芒直指林彪、孔老二，真正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在革命队伍内部，要防止对某些问题纠缠不休而冲淡批林批孔，更不能拉山头，搞分裂，干那些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因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不利于共同对敌的。在革命队伍内部，即使有些争论的问题，也要通过认真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清是非，共同对敌。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在某些问题上认识一时统一不了，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出以公心，顾全大局，从深入搞好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利益出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对少数犯有或多或少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并欢迎和鼓励他们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批林批孔大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真正做好团结大多数，这是我们战胜国内外反动派和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保证，也是发展当前大好形势的基本保证。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场伟大斗争中，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讲路线，讲团结，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共同战斗，去夺取批林批孔运动的新胜利。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郭 寰

保护和改善环境，消除工业“三废”污染，是关系到保护人民健康、巩固工农联盟和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有着长远的意义。

毛主席、党中央一贯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解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增强了抗灾能力。对工业建设进行了合理布局，在广阔的内地展开了大规模建设，许多经济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镇，初步改变了工业偏集于沿海少数城市的状况。开展工业“三废”的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的工作也取得不少的成效。老城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的居住和公共卫生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疾病减少，人口死亡率大大降低。

我国环境面貌不断改善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而且环境完全可以不断得到改善，“三废”污染一定能够消除。经济发展会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并且会不会成为社会公害，关键在于社会制度和实行的路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生产处于严重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环境污染以致成为社会公害是无法避免的。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而且又有一条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有可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处理好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已经出现的某些污染，也一定可以逐步消除。那种认为由于工业的发展“三废”污染“不可避免”的悲观论调，是完全错误的。

发展工业生产与保护环境是对立统一的。它们之间不仅是相互矛盾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只要处理得好，在一定条件下，“三废”污染就可以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用辩证的观点正确认识 and 对待这个问题。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健康，以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发展生产是为人民，保护环境也是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的生产计划，这是完全应当的，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样，消除工业“三废”污染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促进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也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应尽的责任，也完全应该做好。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一个工厂，一方面为国家、为人民生产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又听任有害物质危害人民，这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和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尽管生产任务能够完成，也不能算是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

经验证明，如果只顾工业生产，不注意保护环境，到头来，工业生产也搞不上去。比如，带有腐蚀性物质的废水、废气，任其泛滥，会毁坏生产设备和厂房建筑；“三废”污染了水源，败坏了水质，产品质量就要下降，甚至影响某些产品不能生产；“三废”污染危害职工健康，也将影响到生产效率。有一个化工厂，过去由于不重视“三废”治理，曾经造成产品质量没有保证，生产效率下降的后果。后来，他们大搞综合利用，积极治理“三废”，经过两年的时间，基本上消除了“三废”的污染危害，并且减少了原料、燃料的消耗，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连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还为国家增产了大批综合利用产品。这个事实说明：发展工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环境保护的问题，同时也增强了保护环境的能力；环境得到了保护和改善，又会给工业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进一步促进生产发展。



保护环境，特别要注意保护和改善广大社会主义农村的自然环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发展了，工业才能有更大的发展。因此，保护和改善广大社会主义农村的自然环境，使其不被污染，保证社会主义农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件带有战略意义的事。各个地区、部门，尤其是工业生产部门，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农村是广大农民进行生产劳动的地方，能否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保护和改善农村自然环境，这又直接关系到工农联盟的巩固。有一个铜冶炼厂，他们起初忽视对二氧化硫烟气的回收处理，影响周围农田作物的生长。经过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支援农业还是危害农业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厂领导深入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坚持试验，终于制成了一套回收装置，消除了烟害，而且还回收硫酸制造磷肥，从而化害为利，支援了农业生产，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有的人对工业危害农业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有的工厂甚至宁愿年年拿钱赔偿农业损失，而不抓紧认真治理“三废”危害，这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及时防治工业“三废”对农业的危害，并且要通过综合利用，化害为利，生产支农产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是防止污染、保护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为工业的合理布局 and 环境的保护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恩格斯指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我们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安排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生产和生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使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发展新兴工业，合理布局很重要。我国工业布局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的精神，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多搞小城镇，这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战略措施，也是解决发展工业和保护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小型城镇具有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样一些特点，对环境保护极为有利。城镇规模小、人口少，工业



和生活的污物比较容易处理。城镇周围有广阔的田野、纵横的河流和茂密的树木，即使排出少量的有害物质，也易于稀释和净化。有的同志片面强调大城市建设条件好，总是愿意继续在大城市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使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城市规模大了，用地、水源、住房、交通运输、农副产品供应以及其它公共福利设施等，都会造成许多困难，对建设并不有利。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严格控制现有大城市的规模。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老城市，控制城市人口，对污染环境的工厂分期分批进行治理，不断改善城市的环境。

在工业建设中贯彻实行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这是保护环境的一个积极的和有效的做法，是“预防为主”的方针在工业建设上的具体应用。这样做，就使许多“三废”有害物质被消灭在生产过程中，或一产生出来就立即得到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经验证明，环境的污染往往可以较快形成，而消除这种污染，则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如果产生了污染或污染严重了再去治理，不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有的也难于很快取得良好的效果。某些有害物质的危害有时还是潜在的，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因此，我们要把工作做在前头，在“三废”出现之前就消灭它，为人民除害兴利，为子孙后代造福。

正确地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是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自然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各种因素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当人们变革某一自然条件的时候，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因此，在安排工农业建设的时候，要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避免和克服盲目性。无论是采伐森林、开发矿山、兴建水利工程还是草原、山林的垦殖，都要既看到它收益的一面，又要考虑可能对气象、水文、水生物、水土保持等各个方面的生态条件的影响。在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工业建设中，也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如工业企业的厂址选择，不仅要注意原料、动力、水源、交通等条件，也要考虑地质、地形、水文、气



象等条件，加以综合研究，妥善安排，使之不致对居民造成不利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环境保护工作涉及面非常广泛，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搞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国家的环境污染，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关于污染的危害，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秘而不宣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都是为着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应该经常向群众宣传环境保护的意义，并且发动群众揭露矛盾，制订防止和消除污染的措施，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护环境。有些单位的领导不去主动进行这种宣传工作，向群众讲明情况和问题，这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广大职工，有消除污染、改善环境的迫切要求，有治理污染的无穷智慧，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三废”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有一个炼油厂，为了消除钨酸对空气的污染，先是靠少数人关起门来搞，贪大求洋，花了许多钱，搞了八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树立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土洋结合，修旧利废，没有向国家要投资，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回收装置，消除了污染危害，并回收了钨酸，每年还为国家创造三百多万元的财富。许多事实说明，只要群众行动起来，就会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少花钱，多办事，取得多快好省的效果。

消除工业“三废”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路线是根本，关键在领导。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级领导把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认真做好规划，广泛发动群众，大搞综合利用和采取其它治理措施，一定可以做出新的成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要有更大的发展，现在就抓，为时不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而且也能够建设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劳动和生活环境。



批 林 批 孔 反 修 防 修

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研究儒法斗争

方 铎

当前,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研究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并且指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主席明确指示研究历史是为了“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决不是单纯了解一些历史情况,懂得一点历史知识,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就是说,研究历史是为了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同封建制一样,奴隶制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历史上的法家,最初是作为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处于没落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政治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在成千成万奴隶连绵不断举行革命起义的基础上,顺应历史潮流,勇敢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的口号,其中有的不怕诋,不怕压,在同奴隶主阶级的尖锐斗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



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诚然，地主阶级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同农民阶级存在着对抗的矛盾，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矛盾还是次要的，主要矛盾则是腐朽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与新兴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矛盾。法家的革命作用，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这一点，我们从作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韩非讲法、术、势，而以法为主。他在评论申不害和商鞅时，认为前者“未尽于法”，后者“未尽于术”，各有偏颇；他自己则主张法、术“不可一无”（《韩非子·定法》），同时又必须“抱法处势”（《难势》）。这说明，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和总结经验，地主阶级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已经逐步成熟。经过几年奋战，坚持实行这条革命路线的秦始皇，果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毛主席指出，在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地主阶级这种向反面转化，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就是从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地主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坚持法家路线以外，大部分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革命进取性，转而拣起本阶级先驱者曾经批判过的儒家路线奉为至宝。这样，此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这种斗争或多或少受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激化。“**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代表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比较低的阶层，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对压抑、排挤他们的大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作了某些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反动，法家作为这个



阶级一翼的代表,即使能够尖锐地揭露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在政治上却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真正革命的主张。当然,这是不能苛求于个别历史人物本身的,因为他们终究不可能超出历史的阶级的局限。王安石是著名的革新家,他敢于在尊孔反法的潮流十分嚣张时肯定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线。他的变法对大地主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他所采取的革新措施,有利于抵抗辽和西夏贵族集团所发动的掠夺性的侵略战争。但这些改革既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也不可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对于我们更有启发作用的倒是,王安石即使只是作这样一些改革,也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顽固派如此疯狂的反对,宣布他们之间“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奏弹王安石表》)。明末的李贽不满当时的腐败政治,反对孔教,抨击道学,但他已看不到封建社会的任何出路,最后在反动统治者的迫害下自刎狱中。这些都说明,封建制度在自身固有矛盾的推动下,已不能和没有力量再认真实行法家路线,正在无可挽救地逐步走向它生命的尽头。代之而起的应当是更新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由于清代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系列侵略,使得正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变得如此软弱,以至要背靠着帝国主义,手扶着封建主义,才能勉强站立起来。它的几个先驱人物在向封建制度发起冲击时,虽一度也表现得相当猛烈,但作为其最后成果的辛亥革命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历史证明,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正确评论法家的进步性的任务,不能由资产阶级自身,而是要由它的对立面中国无产阶级来完成。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革命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在取得政权以后,始终保持革命朝气,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不是回避、而是紧紧抓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社会矛盾,通过继续革命,推动历史逐步地向共产主义前进。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提高我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自觉性。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提高我们自觉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批判儒家著作,包括批判处于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顽固派为了培养本阶级接班人而炮制出来的通俗性的孔孟读物,如《三字经》之类,评注法家著作,



包括编讲法家人物一些斗争故事，都要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都要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个纲，从而使我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在历史上，儒法两家又以坚持分封割据与坚持集权统一相对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古风第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创举对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历代法家代表人物大都对此作过肯定的评价，有的还据此对当时的分裂状态发出了抨击，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一篇代表作。这篇著名的论文，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郡县制优于封建制，目的在于批判唐代握有重兵、反叛中央的藩镇割据势力，提出“善制兵，谨择守”的治国方针，坚决维护国家的集中统一。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总的趋势是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就说明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联合，是全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这种愿望的实现，又是与坚持集中统一的法家代表人物同坚持分封割据的儒家代表人物进行斗争分不开的。在侵略者面前，法家一般都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卖国。在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使得我们的国家，国内各民族，出现了空前统一、团结的局面。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林彪一伙妄图破坏国家的统一，分裂党的团结，必然会遭到如此可耻的下场，这是因为分裂的行为既不符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联系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一伙搞分裂活动的阴谋，克服妨碍革命队伍统一、团结的思想和行为，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在历史上，法家一开始就是以奴隶制生产关系改造者的面目出现的。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曾竭力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糴”等政策，较快地发展了封建主义经济。后来拿着李悝的《法经》，从魏国跑到秦国，辅助秦孝公变法的商鞅，更认为“农战”是“治国之要”，以至官吏的选拔，国风的教化，都必须以这个“要”为基础（《商君书·农战》）。先秦时期的法家，从“初税亩”到“开阡陌”，进行一系列的变革，用封建制生产关系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是一次大解放。秦汉以后的法家，虽然不能对封建制生产关系提出根本性的革命措施，但在他们掌握政权或影响所能及的情况下，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调节和改革，使当时的生产力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相对立的儒家，虽然天天穷凶极恶地追求物质享受，但口头上，孔丘“罕言利”（《论语·子罕》），孟轲“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事实上，对于国家、社会的实际问题，国计民生问题，他们也确是一窍不通，以至当有人问起为政之道时，孔丘竟说出“去兵”、“去食”，单留一个虚伪空洞的“信”字去同敌国相对抗这样蠢猪式的谎话来（《论语·颜渊》）。“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李白对于孔孟门徒的批判，可算抓到了一个要害。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全部上层建筑借以确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法家比较注意生产问题，目的还在于建立或维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地主阶级政权，这就决定了法家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下，广大农民群众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制和束缚。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以后，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求摧毁越来越走向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只是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把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经济工作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一定要坚持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深入批判修正主义的办企业



路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主动地、不断地调节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进一步发挥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努力把工业生产搞上去，农业生产搞上去，各项事业搞上去，多快好省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斗争从来是有紧密联系的。这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得十分明白。解放初期，就有人捧出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的大流氓、大恶丐、大债主、大地主武训，妄图与社会主义潮流相对抗。接着，胡风反革命集团又借西汉搞倒退复辟的吴王刘濞请诛法家代表人物晁错以“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到六十年代初期，在刘少奇的指使下，“三家村”里的人们，又用歪曲历史、抹杀阶级斗争的手法，炮制了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猖狂地要为罢了官的反党头子彭德怀“请命”，要翻党中央庐山会议的案。林彪更是借咒骂秦始皇等法家人物，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复辟资本主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向无产阶级进攻，经常要利用、歪曲和捏造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为他们的反革命事业开路。而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打败地主资产阶级的进攻，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有千百万群众参加，单靠少数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作为批林批孔主力军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正在意气风发地努力战斗，工农兵理论队伍正在战斗中成长壮大。乘着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我们要重视群众的创造，及时帮助他们搞好经验总结，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一方面要使专业理论队伍同工农兵理论队伍结合起来，同时也要使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学习、批判同广大群众的学习、批判结合起来。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工作，必将得到更好和更深入的开展，并将在斗争中培养出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评《韩非子》

梁 凌 益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猛将，也是先秦杰出的法家理论家。《韩非子》这部充满着强烈战斗气息的批孔文献，生动地记录了地主阶级战胜奴隶主阶级的艰难战斗历程，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集法家思想大成的著作。我们要彻底地批判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要科学地分析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批判地总结法家批孔的历史经验，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一下《韩非子》，是有益处的。

—

韩非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

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是阶级斗争激化的时代。自春秋末期以来，在强大的奴隶起义的推动下，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已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到了战国初期和中叶，魏、楚、秦、韩、赵、齐等国已经普遍地出现过变法的高潮。如韩国，任用法家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史记·韩世家》）。在齐国，任用邹忌为相，聘请法家慎到为顾问，“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但是，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从战国中期商鞅被害开始，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内，各国掌权的大都是程度不同地信奉儒家思想的奴隶主贵族。只有秦国，从秦昭王四十二年起，先后任用范雎、蔡泽，驱逐了穰侯魏冉，新兴的地主阶级才夺回了政权。但秦昭王死后不久，吕不韦又窃取了政权，成为战国末期奴隶主和儒家的主要代表，直到秦始皇亲自掌握政权，才粉碎了他的复辟阴谋。战



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走了一个“之”字形，除了秦国外，其他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反复辟斗争，成效甚少。

为什么地主阶级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却一直没有能够牢固地确立本阶级的统治？怎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奴隶制复辟呢？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战胜奴隶主阶级，必须对长期而激烈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出理论上的总结。《韩非子》的问世，是为这个任务服务的，它标志着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逐步趋于成熟。如果说，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在从事变法的过程中，都各自从一个侧面实践和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来不及从理论上制定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的思想政治路线，那末，到了战国末期，解决这个问题历史条件成熟了。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进入了决战阶段。地主阶级面临着最后统一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同时，地主阶级在同奴隶主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总结这些经验，成了新兴地主阶级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当时，秦国的商鞅学派在秦昭王时代整理、发表了《商君书》。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况，也为地主阶级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但系统地总结地主阶级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最后落到了荀况的学生韩非肩上。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儒家和法家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战国初年，韩国曾进行过变法，但后来奴隶主贵族又重新上台，韩国开始由强转弱，并逐步成了秦国的附属国。韩国在当时七国中是最弱的，到韩非时已“事秦三十余年”，正象韩非所指出的，韩对于秦国“与郡县无异”（《存韩》）。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韩非曾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政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挠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韩非在亲身参加韩国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韩非子》一书中的主要作品，如《孤愤》、《说疑》、《五蠹》、《显学》、《忠孝》、《定法》等，都是在韩国写成的。韩国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当时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斗争。

韩非在建立他的法家学说时，也并没有停留在韩国一国的经验上。他从本国



儒法斗争的实际出发，考察了其他各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状况，为新兴地主阶级统一六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思想武器。战国时，齐、楚、魏、赵、燕都曾称霸一时。为什么它们都只能崛起于一时，却又很快衰落下去，而原来落后的秦国却越战越强呢？韩非在总结了七国成败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一条“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他把秦国和魏、赵、韩三国作了比较，指出：“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毕也。”（《外储说左上》）魏、赵、韩三国，推行了儒家路线，造成“弱乱”；秦国实行“法治”，路线对头，所以能够强大。但秦国在当时为什么还“未帝”，也就是说，未能统一六国呢？原因还是在于“治未毕”，即法家路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韩非还把秦国和楚国作了对比。楚国和秦都实行过变法，但吴起在楚国变法时间很短，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去世后，变法也失败了。相反，商鞅在秦实行变法的时间久，对反动奴隶主贵族和儒家的打击比较有力，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和氏》）。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韩非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观点去分析路线问题，但他在比较了各国对待变法的不同态度后，具体地说明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执行不同的思想政治路线所造成的不同后果。他指出，魏国实行法治时，“强匡天下，威行四邻”，但后来“法慢”，没有认真实行法治，结果“国日削”。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推行法家路线，“人众兵强，辟地齐、燕”，等到赵武灵王死后，“国律慢”，法治不严，同样出现了“国日削”的困境。燕国在燕昭王时法家政治路线一度占优势，“东县齐国，南尽中山之地”，但等到燕昭王去世，“奉法已亡”，很快“兵弱而地削，国制于邻敌”（《饰邪》）。不但关东六国如此，秦国也有同样的教训。韩非指出，秦孝公时，由于实行了商鞅变法，“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和氏》），后来奴隶主贵族实行反攻倒算，魏冉当权，秦国就出现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的局面（《定法》）。韩非从各国执行法家路线的不同情况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为，国亡宜矣。”推行不同路线的效果如此清楚，而那些国君还不实行法治，那么亡国也不奇怪了。韩非还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在国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关键在于是否实行“法治”，“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相反，如果“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



韩非在总结各国变法的经验教训中，还认识到，以往各国实行变法往往失败，不仅是因为奴隶主复辟派的破坏，还由于法家路线本身的不完善。他认为商鞅虽然对破坏变法的旧贵族实行了坚决镇压，但却没有一套防止奴隶主篡权的斗争策略和组织保证，即“无术以知奸”。因此，“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奴隶主复辟派一度篡夺了政权。他还指出，申不害虽然强调了“术”，但只是从组织上策略上作了防止奴隶主贵族篡权的努力，由于“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社会变革不彻底，对复辟派没有进行坚决镇压，往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同时并存，虽然“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成效不大。因此，他认为商鞅、申不害之法“皆未尽善”（《定法》）。对于以主张“势”著称的慎到一派法家，韩非也有批评，认为单靠“势”是不行的，“势”必须和“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总之，韩非对前期法家的各种不同思想派别作了具体分析，吸取其长处。韩非正是在亲身参加韩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总结了战国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特别是总结了前期法家反儒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总结出一条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

二

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关于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的论述，占有突出的地位。

韩非关于必须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王充曾认为：“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论衡·对作》）当时的韩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复辟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集中地表现为“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阶级对立。所谓“智法之士”就是指法家；所谓“当涂之人”，也叫“重人”，是指在韩国窃据政权的奴隶主贵族。韩非在《孤愤》、《说难》、《说疑》中，对韩国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艰难困苦和复杂曲折，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他的《孤愤》篇，集中表达了法家对于篡权的奴隶主贵族的愤怒和批判。韩非控诉了当权的奴隶主贵族对法家人士采取公



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韩国的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正是这种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事实，使韩非认识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孤愤》）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这两个阶级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同样经历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遇到了奴隶主贵族的拚死反抗。韩非从魏、赵、韩等国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钻进政权机构中来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是实行奴隶主复辟的最危险的敌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备内》）。这是由战国末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决定的。当时各国都已不同程度地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阶段，奴隶主贵族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来篡夺政权，成了他们复辟的主要途径。当他们窃取了部分权力后，就“无法而擅行，操国柄而便私”（《人主》），改变法家路线；一旦时机成熟，就“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现奴隶制复辟。

韩非特别指出识别与揭露奴隶主贵族的两面派手段的重要性。战国末期，在韩国等国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是阴险毒辣的政治骗子，他们“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其外小谨，以徵其善”（《说疑》），表面上伪装老实，骨子里诡计多端。这些奴隶主贵族的“重人”，不仅有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要防止奴隶主贵族篡夺政权，就应该粉碎奴隶主复辟集团，清除其死党，即“作斗以散朋党”（《八经》），具体地说，就是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实行强有力的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所谓“法”，指的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所谓“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所谓“势”，就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法”、“术”、“势”三者不可缺一，但其中最根本的是“法”。韩非强调“以法为本”（《饰邪》），这是因为“法”具体地体现了法家的政治路线。“术”和“势”的重要性，仅在于它们是保证“法”的实施



不可少的条件。韩非认为，如果把这三者结合起来运用，就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真正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扬权》）。这就是对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简明概括。为了实行这条“法治”路线，韩非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分封制度和世袭制度，强调“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爱臣》），不允许奴隶主贵族在封邑内搞独立王国，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指挥的武装力量，坚持官吏和军队都必须由地主阶级国家统一管理指挥。

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当然包含着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的一面，我们要批判地加以分析和鉴别。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因此，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产阶级复辟。而即使处在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只是当他们的统治受到反动阶级复辟的威胁时，才需要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韩非子》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对奴隶主贵族的分裂、复辟阴谋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是以韩非的“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武器的。

韩非对法家同“重人”的斗争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革命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当时有个叫堂谿公的儒家之徒用吴起、商鞅惨遭杀害来威胁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必然也会“危于身而殆于躯”，要韩非“服礼辞让”，放弃斗争。韩非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实行法家路线，如果想“避乎死亡之害”，那是“贪鄙之为”（《问田》）。这里，韩非充分表现了进步阶级的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不但不“服礼”，不“辞让”，而且还指出：“礼繁者实心衰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解老》）。儒家鼓吹的“礼”，无论怎样装点门面，也无法改变它衰败的命运。

古往今来，一切尊孔的反动派，对于韩非的理论恨之入骨，对于孔孟的“礼治”百般美化，这并不表明他们强大，而恰好说明他们的“质衰”。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以“克己复礼”为座右铭，妄图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正表明了他同一切日趋没落腐朽的反动派一样不可救药。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成立以来二十五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管国内外反动派怎样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继续胜利前进。

三

韩非在总结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阴谋的斗争时，还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战国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深入的批判，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批奴隶主复辟派还困难得多。在韩非之前，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斗了几百年，没有解决反复辟的问题，除了其他许多原因外，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深入地对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批判。

法家对儒家危害性的认识，是在斗争中逐步加深的。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把儒家的“礼乐”、“诗书”、“仁义”、“孝悌”等，斥之为“六虱”。但商鞅主要是进行变法的实践，没有从思想上对儒家的复辟理论作系统的批判。战国末期，随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批孔成了反对奴隶主复辟的当务之急，荀况从儒家的营垒中冲杀了出来，对嚣张一时的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继承了商鞅的法家思想，认为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学说，都是当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的“奸言”（《荀子·非十二子》），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荀况以来的法家批判孔学的传统，并把对儒家的批判提高到反复辟斗争的首要地位。在《五蠹》、《显学》、《忠孝》等著作中，韩非以磅礴的气势，横扫了儒家的反动思想。他痛斥了危害地主阶级统治的“五蠹之民”，并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韩非认为，不对儒家的反动理论进行批判，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明确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难三》）。这样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他尖锐地揭露了孔孟儒家学派利用“私学”进行复辟活动，“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诡使》），把儒家称之为是和当时地主阶级政权两条心的“私学”，指出这种“私学”的特点是“乱上反世”，跟当时地主阶级革命唱反调。总之，韩非认为，要防止这种复辟活动，就必须“息文学而明法度”（《八说》），即必须对儒家之徒实行专政，捍卫法家的政治和思想路线。



为了推动反复辟斗争，韩非强烈地批判了儒家的复古主义思想。孔孟之徒都是主张倒退的复古迷，疯狂反对任何社会变革。韩非严厉驳斥了儒家“无变古，毋易常”（《南面》）的谬论，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五蠹》），论证了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主张“世事变而行道异”（《商君书·开塞》）的理论，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社会制度也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不变古者，衰乱之迹”（《南面》）。他无情地嘲笑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主张，如同“守株待兔”那样愚蠢（《五蠹》）；指出孔丘吹捧文王，“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难二》），不但颂文王颂错了，对所有古代先王的盲目崇拜都是“愚诬之学”（《显学》）。“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实质上是建立哪一个阶级专政的问题。韩非指出：儒家“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称先王之道”，“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动摇人们实行“法治”的决心。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韩非勇敢地批判了儒家吹捧的所谓圣贤，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同时赞美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认为如果有人今天还去鼓吹尧、舜、汤和周武王的统治办法，必定要为今天的“新圣”所笑，他坚定地相信：“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韩非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奴隶制本身也有一个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但他抬出地主阶级的“新圣”，把奴隶主阶级的“先王”踩到脚下，这在当时对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韩非还批判了儒家的“仁政”学说，论证了地主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强调“当今之世”必须“争于气力”，实质上就是肯定战国时代是地主阶级革命的时代。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他敢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理直气壮地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大喊大叫。而面对奴隶主阶级日益衰落的政治局面，孔孟之流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只能用所谓“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来美化奴隶主专政，反对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韩非在《外储说右上》中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回，孔丘的学生子路熬了一点粥汤给修沟渠



服苦役的奴隶们喝。孔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马上派了子贡等人去阻止，粥被泼了，粥锅饭碗也被砸了。子路弄得很狼狈，气冲冲地跑去对孔丘说：“我这是行仁义呀！你不是天天教我们讲仁义吗？那为什么熬点粥给他们喝都不可以呢？”这对满嘴讲“仁义”的孔丘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韩非揭穿了孔孟鼓吹“仁义”的虚伪性，同时又解剖了“仁义”的危害性。他说，“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说疑》）在儒家看来，“仁义”可以“尊主安国”，这是指奴隶主阶级的“主”和“国”；在法家看来，“仁义”必然会“卑主危国”，这是指地主阶级的“主”和“国”。“慈仁听则法制毁”（《八经》），“仁”的后果意味着毁灭地主阶级专政。谁如果受骗上当，真的去实行“仁义”，就会出现“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的局面。韩非的结论是：“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奸劫弑臣》）。归根到底，这是一场革命，来不得半点“仁义爱惠”。这就是韩非对儒家鼓吹“仁义”的回答。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在批判儒家过程中所表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十分重视《老子》的研究，从中吸取了辩证法的因素并加以积极的改造。《解老》、《喻老》这两篇在先秦哲学史上焕发异彩的作品就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的。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道家老聃那里，在唯心论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辩证法的因素被用来为没落的奴隶制辩护，表现为消极的东西；而在法家韩非这里，则完全被用来为新兴的封建制辩护，从而表现为积极的东西。韩非用朴素的辩证法作为思想武器，尖锐地驳斥了儒家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和中庸之道。他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他用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观察社会历史，得出了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结论，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五蠹》）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事业提供理论根据。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守旧复辟之道，它鼓吹折衷调和，强调保持旧质的稳定性。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折衷调和。他明确地指出：“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显学》），强调儒法两家之间是没有调和余地的。韩非忠实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为扫荡反动的孔学而终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韩非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了较为系统的批判，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杰出水平。但他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把历史的发展都说成是“有圣人作”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的，倒是少数英雄创造的。由于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在《孤愤》等文章中，总是感到自己势孤力薄。他把社会矛盾的出现说成是人口增多造成的，认为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他企图从经济上去解释社会矛盾，本意是为了否定孔孟的“仁义”说教，但结论却落到了错误的“人口论”上去。这表明韩非的历史观说到底依然是唯心史观。这也决定了韩非不可能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也没有能够完全战胜孔孟之道。特别是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套维护剥削制度永恒性的反动说教，韩非更不可能有丝毫批判。这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只有用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只有科学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类反动观点驳倒。彻底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并战而胜之，这个历史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韩非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自见之谓明”（《喻老》），就是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但是，人类要真正认识自己需要经历一条多么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啊！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韩非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总结当时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是毕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不可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他所代表的阶级本身。“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类，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去揭露和批判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儒法斗争，作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结论，为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李自成起义军对二程的批判

钟 宙

程颢(公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年)和程颐(公元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年)(合称二程),是北宋时期儒家的代表,反动理学的奠基人。孔孟之道经过他们的加工和阐发,捧得更高,流毒更广。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吹捧二程是“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历代感德铭石以垂后世》)北宋以后的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是处于没落时期的地主阶级,他们把二程炮制的理学当作维护其日益腐朽的反动统治的至宝。国民党反动派、苏修叛徒集团,都极力吹捧程朱理学。与这些反动派一样,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权复辟,从孔孟之道中寻找反革命思想武器,竟然把唯心论的儒学贴上“唯物主义”的标签。相反,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痛恨孔老二和鄙视二程的,对他们的反动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和批判。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抨击二程及其反动理学的斗争,就是当时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演出的一个场面。他们的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他们的壮丽业绩,在中国劳动人民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程颢和程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代。北宋王朝封建统治集团推行的对内扩大兼并、对外屈辱投降的反动路线,造成了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严重局面。“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同伙)强如一火”的农民起义,动摇着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二程抛出反动理学,正是为了对抗规模宏大的农民阶级的进攻,加强对农民的镇压,维护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

二程炮制的反动理学,是地主阶级尊儒反法路线的进一步发展,它是鼓吹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反革命理论,是地主阶级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日益衰落时期地主阶级的意愿,适应了反动阶级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开历史倒车的政治需要,对于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反动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样,二程及其反动理学,被后来反动派所尊崇。



特别经过朱熹的发挥，这种反动说教更成为天经地义的封建法典。二程的地位也被抬得越来越高。南宋理宗读了二程的反动著作，感到“启沃良多”，加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为了表明其尊儒反法的立场，还特地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孔庙中撤出来，将二程的牌位搬进去。从此确立了反动理学的儒家正统地位。

到了明代，封建制度更加腐朽、反动了。随着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及其所激化的各种矛盾，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城乡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汹涌澎湃地在全国各地展开。十六世纪以后的明王朝，犹如一座柱倾梁歪的大厦，支撑不住，岌岌乎不可终日。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颓势，明朝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加紧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挥舞起屠刀，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把反动理学规定为统治思想，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大力宣扬程朱理学，进一步加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农民阶级的专政。基于这种极端反动的政治目的，明代封建统治集团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尊孔崇程的反革命逆流。他们肉麻地吹捧孔丘为“至圣先师”，孟轲为“亚圣”，说二程是“真儒”，论其功绩，“亦当不在孟子下也”。（林应龙：《奉敕重修两程夫子祠碑记》）明朝政府利用政权力量，不断颁赐祭程的制度，拨钱修葺扩建程墓、程祠和二程书院。不仅如此，明代封建统治者还把尊程的范围扩大到二程的后代。公元一四五五年，明代宗赐给二程第十六代孙程克仁“翰林院五经博士”的头衔，世代相袭，并免除一切差徭。公元一四八九年，明孝宗又下令，将程氏后裔，由民籍改为“贤籍”。在明代封建统治者这样庇护、支持下，不但二程的地位被抬到空前的高度，他们的后代也变成享有种种特权的恶贯满盈的大地主。

二

毛主席指出：“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明代封建统治者，是一伙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满以为抬出二程的亡灵，大力表彰二程及其反动理学，就能阻挡农民革命的潮流，使他们免于覆亡。然而，所得的结果，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尽管二程的祠庙里，四时香烟缭绕，却掩盖不住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农民的暴行；被二程反动理学强化的四条绳索，也捆绑不住革命农民的手脚。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二程家乡嵩县和程墓所在地伊川的劳动人民，采取各种形式反击明代封建统治者掀起的尊孔崇程的逆流。伊川鸣皋地区的人民，抵制重修伊川书院和程家后裔查复伊川书院的田亩



的斗争，使得地主阶级的阴谋不能得逞：“田竟不可问，书院荒圯殆尽”。（汪楫：《重修伊川书院记》）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把农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汇聚在李自成起义军周围的千百万农民群众，冲破束缚他们的罗网，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反封建斗争的战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同地主阶级进行着生死搏斗，还在思想战线上向孔丘和二程展开了进攻，猛烈抨击了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反动理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用“均田”、“免粮”的革命思想批判吃人的理学。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孔丘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把反动孔学发展成理学，抬出“天理”来为封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论证。他们大讲什么“富贵由来自有天”，（《二程全书·明道文集》）把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农民受苦受难的原因，说成是天所赋予的、命中注定的。要劳动人民甘心接受他们的统治，不要起来造反。李自成起义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愤怒指出，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天理”的安排，而是由于“朝廷失政”，“岁饥赋重”，“王侯贵人剥穷民”的结果。这就剥开了“天命论”的画皮，揭露了当时农民阶级破产贫困的原因。他们冲破“三畏”的束缚，作《九劝九问》，号召各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动人民起来造反。他们高举“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大旗，明确提出“取天下”，就是要推翻自称“承天应运”的明王朝，变地主阶级的天下为农民阶级的天下。这就从思想上批判了二程之流所一再鼓吹的“天理”的谬论。

二程还提出“灭私欲，则天理明”（《二程全书·遗书》）的反动政治主张，把吃人的封建制度说成为“至善”的“天理”的体现，把反抗封建统治的言行诬蔑为“万恶”的“私欲”。他们要求人们“克尽己私”，“视听言动，非理不为”，（《河南程氏遗书》）其反动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根除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李自成起义军，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革命传统，根据当时农民阶级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明确提出“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并且发布文告，编制歌谣，组织宣传队，深入城乡，用“均田免粮之说”、“割富济贫之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他们还把“均田”、“免粮”的斗争纲领具体化为政策，力图按照平均、平等的思想，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面貌，向往于建立一个使“贫汉”“大小都欢悦”（计六奇：《明季北略》）的理想社会。李自成起义军提出的这些革命主张，不但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地主剥削农民的“合理性”，同时也是对维护封建



剥削制度的反动理学的大胆否定，它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用革命暴力横扫理学所维护的封建秩序。

二程竭力鼓吹“等差分别，莫敢逾僭”，（《二程全书》）“天理如此，岂可逆哉”，（《河南程氏遗书》）妄图以此来束缚劳动人民的手脚。李自成起义军，针锋相对，所到之处，“杀富济贫”，“为民除害”，杀了一批血债累累的藩王、宗室、官僚、地主、绅士。他们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被霸占的田产，带领农民没收官府、地主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他们强迫贵族、地主服从革命法规，如有违抗，立即严惩。地主分子惊呼：农民军占领郑州后，“奴隶棍徒，绝无礼体”，“奴（奴隶）坐于上，主（地主）歌于下”，贵家大族“覆宗绝祀者，不可胜纪”。（张桎：《流寇记》）从这些反革命的供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破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猛烈地批判了二程所鼓吹的“等差分别，莫敢逾僭”的反动信条。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二程和明代反动统治者竭力用反动理学来强化这四条极大的绳索，而李自成起义军则力图用革命手段推倒“四权”统治。起义军转战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捣毁明朝各级官府，建立农民的革命武装和政权机构，表现了革命农民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和力量。他们捣毁城隍庙，把阎罗天子、城隍老爷以至土地菩萨一个个打翻在地，表示了对神权的大胆否定。他们焚毁宗族祠堂，砸碎各种牌位，深刻地批判了族权。广大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英勇杀上对敌斗争的战场，同阶级兄弟并肩战斗，为农民起义事业而献身，有力地打击了孔丘和二程鼓吹的“男尊女卑”的吃人礼教。这种革命行动，把地主阶级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使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这种扫荡，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痛击尊孔崇程逆流。

一切文化，“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朝时期，大力刊行儒家的反动书籍，大规模兴建尊孔崇程的各种建筑物，这是当时反动派为了镇压劳动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反抗，拼命强化思想统治所采取的反革命措施。针对这股尊孔崇程逆流，李自成起义军广泛地开展了焚毁儒家书籍，捣毁尊孔崇程建筑物的斗争。

起义军所到之处，烧毁尊孔的文庙，把明代反动派奉为“至圣先师”的孔丘的



偶像，打翻在地，踩在脚下。根据刘仲舒的《文庙碑记》的记载：各地文庙的“遗迹鲜有存者”。嵩县的先师庙“颓坏”，祭器乐器“残缺”。澠池、叶县的文庙被焚毁，成了一堆瓦砾。伊阳（今河南汝阳）文庙，“仅存正殿两楹”。（王士儆：《重修大成殿碑记》）起义军对于儒家“经典”，也极端蔑视，他们烧毁了大量的儒家书籍。他们冲进嵩县，把程庙中珍藏的《四书》、《五经》和《二程全书》以及宋明以来孔门信徒表彰二程的石碑，统统毁掉，无有存者。嵩县封建官府保存的“典籍文献”，也被起义军焚毁，“斯灭无存”。（《嵩县志·原叙》）

二程祠庙，是封建统治阶级尊程、祭程的场所。明代地主阶级为二程建造的专祠，在河南至少不下二十余所。在起义农民的打击下，规模宏伟仅次于曲阜孔庙的嵩县程村的二程祠，“庙貌倾圯，俎豆（祭器）沦落”。（《两程祠墓源流》）“制如孔庙”的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二程祠，这时也是“颓垣圯壁”，（武攀龙：《重修二程夫子祠堂记》）“荡然为墟”。（董笃行：《重修理学尤夫子祠记》）起义军还捣毁了伊川程墓。明代地主阶级修建的二程书院和程氏义学，也几乎全部被起义农民烧毁。起义农民的这种焚毁儒家反动书籍，捣毁尊孔崇程建筑物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孔丘和二程的极端鄙视，表现出劳动人民对孔孟儒家传统思想的极端憎恶。历史铁证无情地撕破了一切尊孔派的画皮，有力地回击了苏修鼓吹的“儒学”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无耻谰言。

第四，诛杀反动儒生和程家博士。

李自成起义军反封建、反孔反程斗争的革命壮举，触动了明代封建统治集团和反动儒生，特别是二程后代的“程家博士”的痛处，激起了他们的疯狂的反扑。为了把他们的反动气焰打下去，起义军采取了诛杀反动儒生和“程家博士”的革命措施。

农民军攻克洛阳，生擒了大官僚地主吕维祺和大贵族福王朱常洵。朱常洵跪倒求饶，吕维祺口诵孔孟之道，企图顽抗，当即被起义军处以死刑。起义军进逼嵩县，程家大地主程宗周伙同官府守城顽抗。公元一六四一年三月，李自成亲自率领农民军攻打嵩县县城，昔日受尽程家大地主剥削和压迫的佃户、庙户，纷纷参加起义行列。“负门板，挟短锹穴城，砍学官古柏为云梯”，（《嵩县志》）军民协力，不到半天时间，就把县城攻占了。程宗周死于炮火之中。农民军乘胜直捣“二程故里”程村，杀进阎王殿，对于横霸乡里、对抗起义、固守祠庙的“程家博士”坚决镇压，诛杀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程佳祚和程接道于九皋山下。起义军



的这种革命行动，吓得程家大地主魂不附体。他们怕捉怕杀，化装易服，仓皇逃命。程家第二十代孙程宗昌心有余悸地说：这时他们“户无安居之所，人鲜糊口之资，弃坟墓而转徙他乡者十有八九”。（董思凝：《记述博士程公字德征懿行碑》）正是由于起义农民对程家大地主采取了这样坚决镇压的革命行动，才迫使他们在半个世纪时期内，不敢强迫向佃户收租，不敢强迫农民纳贡服役，不能修葺尊程的祠庙、坟墓和书院，甚至连每年春秋二祭也不敢进行了。

三

毛主席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抨击二程及其反动理学的斗争，是当时条件下劳动人民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战争的巨大威力。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反孔、批孔斗争最积极的力量。

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告诉我们：有尊孔，必有反孔；尊孔愈甚，反孔愈烈。尊孔的只是一小撮反动派。劳动人民要前进，要革命，必须砸烂孔孟之道这副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英勇抨击二程的斗争，在我国人民反孔斗争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代替封建生产关系，也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彻底揭露和批判孔学的反动的阶级实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只有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作锐利武器，经过长期、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批判和战胜孔孟之道。

林彪一伙继承历代反动派的衣钵，祭起尊孔崇儒的破旗，把“克己复礼”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妄图借孔老二之尸，还资本主义之魂，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服务。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只能遭到彻底的失败。

在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进行战斗，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法家著作，充分发挥工农兵主力军的作用，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深入、普及和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把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

天津第二毛纺织厂党委会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切实加强领导，坚持学习制度，组织全厂职工紧密联系批林批孔的斗争实际，**认真看书学习**，着重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部分干部和工人还学习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通过学习，全厂职工的思想水平和批判能力有了提高，并培养了一支理论队伍。在党委领导下，干部、工人和理论骨干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编写了《儒法斗争史》、《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等讲稿，向厂内外群众宣讲七十多次，评注了商鞅、韩非、柳宗元等法家代表人物的部分著作，进一步批判了《论语》、《中庸》、《孟子》、《三字经》等宣扬孔孟之道的坏书和反动谚语，使批林批孔运动继续深入地向前发展。

在批林批孔中要不要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在斗争中逐步端正认识和正确解决的。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学习马列著作和当前的斗争“结合不紧”，看书学习应当给运动“让让路”。党委及时地进行了讨论，也发动群众开展讨论，大家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靠什么同敌人斗？工人们说得好：“打狼要棒，杀敌要枪，批林批孔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热烈的讨论，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不是坚持认真看书学习，掌握理论武器，是能不能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的关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在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的自觉性。

通过学习的实践，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坚持看书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才能彻底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批林批孔开始后，全厂职工



怀着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但有些同志只是就事论事地批，对于林彪搞“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以及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批得不深刻。党委重温毛主席关于“**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的教导，认识到，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个人的经验，不很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抓不住本质，击不中要害。在党委领导下，工人和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要指示，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批判了“克己复礼”这一反革命纲领。许多工人批判说，从政治上看，“克己复礼”的要害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从思想上看，“克己复礼”的反动性就在于：反对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而前进，坚持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而倒退，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无产阶级必定要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定要战胜资本主义，“克己复礼”根本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样一分析，大家心里豁亮了，认识更深了。又如，染整车间补呢工段的工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联系解放前这个厂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起家的罪恶史，对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核心——“仁”进行了深刻批判。这个厂解放前名叫“仁立”，其实是靠残酷剥削我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立”起来的。过去我们工人虽然身受资本家的剥削，但却不知道资本家是如何进行剥削的。马克思主义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事实正是这样。“仁立”建厂仅二十三年，资本家腰包里的总资本就猛增了三十倍，由一个厂发展到几个厂。这充分揭穿了所谓“仁立”完全是骗人的招牌，也彻底暴露了孔老二鼓吹的“仁”完全是为反动没落阶级的丑恶剥削行为作掩饰的。

坚持看书学习，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并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广泛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活动。在研究过程中，大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儒法斗争的性质是什么？如何正确评价法家的进步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为什么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等等。有些问题，有时争论不休，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要回答这些问题，



除了掌握必要的历史材料外,更重要的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历史的指针、衡量是非的尺子。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正确地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在党委的领导下,广大职工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和认识封建制必然代替奴隶制这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运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奴隶、农民起义与法家进步作用的关系;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运用矛盾转化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的历史必然性,等等。

在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使全厂职工进一步加深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加深了对批林批孔伟大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促进各项工作迅速向前发展,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厂条染车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组建的一个车间,干部和工人都是从兄弟车间抽调来的。当时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胜利了,主要的应该把生产搞上去,因而放松了抓阶级斗争,隐藏的阶级敌人就乘机兴风作浪,使革命和生产受到影响。车间党支部带领职工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批判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不忘党的基本路线。现在这个车间的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深入批林批孔,真抓革命、促生产,成为先进单位。全厂各车间的形势越来越好,革命步步深入,生产蒸蒸日上。今年上半年我厂生产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点六九;同时还试验成功了精纺巡回操作坐车化、染呢下料自动化等几项大的技术革新项目。事实进一步证明,革命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就能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为了在批林批孔中坚持看书学习,我们注意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早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厂的工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组织起哲学小组,涌现了一批工人理论骨干,对全厂干部和工人的学习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批林批孔以来,党委总结了过去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了理论队伍的建设。党委负责同志亲自抓,以政治业余学校、工人业余理论小组为基地,培养了一批新的理论骨干。现有工人理论骨干一百九十八人,占全厂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左



右，分布在各车间、班组和科室，每个学习小组都有一、二人。他们是带动群众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骨干力量。他们登台讲课、编写辅导材料、解答疑难问题，带动和帮助了群众的学习。在抓紧培养理论骨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抓紧广大工人群众的学习。理论队伍帮助群众学习决不能变成代替群众的学习。批林批孔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只有广大群众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才能胜利地进行这场斗争；同时还要看到，理论队伍是在群众运动的斗争中产生、成长的。“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理论队伍必须向群众学习，吸取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学习水平。群众学习搞好了，就会涌现更多的理论骨干。这样把理论队伍的学习和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就能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在批林批孔中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关键在于党委领导。毛主席指出：“**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我们体会到，加强领导，首先要加强思想领导，及时发现和解决学习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使大家始终保持饱满的学习热情。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组织工作。基层单位工作头绪多，往往容易因为安排不当而挤掉学习。党委要统筹全局，合理安排各项工作，一定要保证必要的学习时间。对于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要及时地加以总结和推广，把群众的学习不断提高。此外，切实抓好党委自身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党委学得好，对于群众就是有力的动员。党委一旦放松自己的学习，对于群众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就看不清，对于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也就回答不了，对于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就觉得难以深入。这样下去，不仅会丧失领导学习的主动权，而且会丧失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动权。党委为了搞好学习，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党委常委中心学习组扩大，把全体党委委员和总支书记都吸收进来，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二是领导干部定期到车间参加班组学习，把领导干部的学习和群众的学习结合起来，既便于领导向工人学习，又便于及时发现和解决群众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这样，使全厂出现了群众促领导，领导带群众，互帮互学，你追我赶的学习新气象。

我们在坚持看书学习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还很不够，距离党的要求和实际斗争的需要还很远。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我们决心和全厂职工一起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我们是怎样开展批林批孔的

北京市第一一二中学党支部



半年多来，我们学校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为什么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师生们都说，这是批林批孔的结果。

批林批孔运动初起，有的同志对运动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对如何开展这场运动不很明确，存在着一些思想顾虑。我们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认识到：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它关系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问题。在学校里，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痛击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通过学习，大家也认识到：搞批林批孔，在人民内部，在革命教师里头，主要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思想觉悟。学校里存在的“师道尊严”，是反动的孔孟之道在教育界的流毒，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要手段，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重要工具。革命师生都是“师道尊严”的受害者。批判“师道尊严”，革命师生应当共同把矛头对准林彪、孔老二。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解除了一些教师的思想顾虑，端正了同学的思想认识。革命师生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怎样根据学校的特点开展批林批孔？我们的体会是：要注意使运动 and 教学相结合，使学校运动和社会上的运动相结合，使革命大批判和学习马列主义相结合。

批林批孔运动和教学相结合，首先要摆正运动和教学的关系。孔孟的谬论在教育领域影响较大，过去中小学教材中的尊儒反法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批判。因此，要以批林批孔为纲，使批林批孔深入到各科教学的内容中去，推动教



学进一步改革，不能使运动围绕教学转。无论文科还是理科各门课程，都要力求教学配合运动，密切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以后，我校数理化各课加强了对林彪、孔老二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改变了过去忽视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片面宣扬个人在科学发明中的作用等错误观点，促进了理论教学和生产实践相结合。语文、历史、政治等课对原来的教材进行了改革，删改了尊儒反法的观点，增加了批林批孔的内容，把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学活动。低年级结合教学选批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谚语、格言，高年级批判《三字经》、《中庸》等坏书。象《中庸》这样的坏书，文字生涩难懂，充满了唯心论的杂凑、胡说，许多教员都没有读过。但是，高一同学人小志气大，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们发扬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争当批林批孔的小闯将，知难而进，与老师并肩战斗，终于攻克了难关，剥开了林彪、孔老二所宣扬的“中庸之道”这个骗人之道、复辟之道的画皮。革命小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敢地向孔孟之道宣战，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作文一千二百多篇，编写儒法斗争故事六十多个，还举办了儒法斗争历史的资料展览，在全校作了六次辅导报告，比较系统地讲了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的儒法斗争史。这些活动不仅没有离开教学，反而使同学们在战斗中提高了学习质量。他们兴奋地说：“两、三周学到的，比过去长时间学到的还多，了解了阶级斗争历史，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

我们还在考试制度上作了适当改革，使它同批林批孔运动紧密结合。按照过去的老规矩，考试来临，运动暂停。现在师生们说：在批林批孔中，我们要做革新派，不当保守派；运动不能停，考试要改革。师生们共同研究，大胆革新，把文科考试同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结合起来，要求同学们写一篇评论法家著作或者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分析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问题。这次考试，使广大师生进一步投入了批林批孔斗争。同学们为了批深批透，写好文章，翻字典，查资料，不畏难，不叫苦，有时为了弄清一个问题还跑到大学和校外图书馆求教。这样的考试，同学们既紧张又高兴。他们说：这种考法好！把我们从分数底下解放出来了。过去考试是个人奋斗，这次考试是要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批深批透，这是收获很大的一次考试。

为了搞好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还必须面向社会，把运动和开门办学结合起来。这既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需要，也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需要。开门办学，是



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上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开门办学不能离开批林批孔这个纲。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他们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同阶级敌人斗争最坚决，同传统观念决裂最勇敢。革命师生走出去、请进来，同工农兵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样才能批判得深，提高得快，受教育大。我们一面邀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解放军英雄和革命家长来校作报告；一面还跟邻近的工厂、街道挂钩，每隔一定时间，组织全校师生走出校门同工厂工人、街道居民一起批林批孔。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时，许多受过旧社会反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几重压迫的劳动妇女，愤怒地控诉了儒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反动伦理道德，使同学们受到了生动实际的阶级教育。不少同学过去在课堂上学习鲁迅的《祝福》，光听教员讲解，体会不深。这次听了街道劳动妇女的批判，加深了对孔孟之道的仇恨，再学《祝福》，体会就大不一样了。在同学们编写《〈中庸〉批注》时，原来只是就事论事地批，没有联系它出笼的背景。工农兵看后指出：反动派编坏书都是为了制造反动舆论的，是为它本阶级当时的政治服务的。不讲清时代背景，怎么进一步揭露他们的反动目的？同学们听了很受教育。《〈中庸〉批注》修改后，提高了批判质量。事实证明，只是在学校里搞批判，不容易搞好；开门办学，同工农兵相结合，就能使学校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更深入。

为了使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师生们深深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把孔孟之道作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要战胜它们、批倒它们，也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批林批孔以来，全校革命师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热情很高，各种形式的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小组不断涌现出来，不仅教职员工都参加了，绝大多数同学也都组织起来了。有的小组还把家长包括进来共同学习。这样的学习小组学得生动活泼，学生热心，老师称心，家长放心。在开展群众性的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的活动时，我们在明确了研究儒法斗争史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关系以后，组织师生共同制定战斗方案，各年级、各班努力做到四定：确定学什么（学习哪些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评什么（评论哪个法家人物和著作）、批什么（批判哪些儒家的反动言行、反动故事等），以及在什么时间完成，既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热气腾腾，也要求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搞得扎扎实实。同学们在



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高二(2)班同学根据毛主席关于“**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教导，敢想敢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了那个散发孔孟之道臭气的《三字经》。他们结合批判它宣扬的“人性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结合批判它宣扬的“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结合批判它宣扬的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学习“**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结合批判它宣扬的“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观，学习毛主席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提高了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水平，也提高了同学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些生动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广大青少年能够从小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批判孔老二，这对于他们将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半年多的批林批孔运动，教师在改造世界观、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的进步。他们热情赞赏革命小将敢于批判孔老二的革命精神。有的教师说：我过去对学生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估计不够，现在是真正服了气。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是今胜于昔，学生是一代胜一代。我一定要打掉暮气，焕发朝气。教师们普遍感到：批林批孔，越批，头脑越清醒；越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决心越强烈，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干劲越大。批林批孔也锻炼了学生，培育了学生。一些后进同学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和孔老二的“读书做官”、“变相劳改”和“读书无用”等反动谬论之后，都有了较大转变。一个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比学赶帮的生动局面在同学中出现了。几个月来，全校发展了六十多名团员，还有五百多名同学加入了红卫兵。许多同学纷纷向组织表示决心：毕业后坚决上山下乡，走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光辉道路。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距离毛主席、党中央的要求还很远。我们面前的任务还很多，很艰巨。目前，一个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热潮正在我校兴起。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反动实质，并把这一任务同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结合起来，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我们决心继续作战，争取更大的胜利。



劳动人民就该做主人

山东邹县野店大队党支部书记 郑成礼

孟轲，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二号圣人，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他有一个反动观点，叫做“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称奴隶主为“君子”，骂奴隶是“野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生来就是供养统治者的。这是他恶毒诬蔑劳动人民，宣扬唯心史观的反动谬论。我们野店，就是孟轲诬蔑的所谓“野人”居住的地方，六百多年前，就成了孟府的佃户村。一提起孟轲这个反动观点，我们贫下中农真是恨得牙根痛。

孟轲提出这个反动观点，是为他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他活着的时候，是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阶级斗争很激烈。奴隶们到处造反，新兴地主阶级也起来夺权，天下大乱。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法家，坚持革新前进的路线，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耕战政策等进步主张。孟轲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推行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路线，拼命反对社会前进。他咒骂法家是“暴君污吏”、“民贼”、“罪人”，疯狂叫嚣对法家要杀，杀，杀。他提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种谬论，正是和当时法家的主张相对抗，是为了救奴隶主的命，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阻止社会历史发展的。孟轲这个谬论一提出来，就是对历史的反动。后来，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把这个谬论作为欺骗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

在孟轲看来，“野人”离不开“君子”，劳动人民离不开统治者。没有他们这伙统治者，地球就不转了，五谷就不长了，六畜就不旺了，劳动人民就没法活了。统治者简直是救民的菩萨，治世的英雄。总之一句话，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这完全是孟轲为了“治”我们劳动人民而编造出来的歪经邪理。

劳动人民不是离开统治者没法活，而是被统治者“治”得没法活。我们野店的贫下中农，解放前，世代给孟府作佃户，吃够了“君子”“治”我们的苦头，最懂得孟轲所说的“治”是什么东西。他说的“治”，就是政治上的血腥镇压，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思想上的束缚奴役。孟府设有公堂，备有各种刑具。凡是孟府的佃



户、仆役“犯了法”，孟府可以自行传讯、审理、治罪。被抓的百姓，遭受严刑拷打，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孟府的“君子”们，拿着劳动人民根本不当人待。在他们日常开支的流水帐上，总是把佣人的吃食和牲口饲料开列在一起。我们村住着六户“二地主”。他们是孟府的爪牙，掌握着生杀大权，催租逼债，榨取钱财，任意欺压我们贫下中农。我们野店三千七百亩耕地中，孟府的租田就有二千四百亩。租种孟府的土地，无论草地（荒地）苗地，不管丰年歉年，租粮颗粒不能少。交租时，先要交“验色粮”，还要过风车，过大斗。经过层层剥皮，往往一百斤粮食只能顶五、六十斤。人们说：“孟府算盘响，穷人眼泪淌，交租如进鬼门关，一关更比一关难。”孟府要一个花招，佃户就要去一层皮。有一年，我家砸锅卖铁，东求西借，用能买一头牛的钱做“押金”，租种了孟府六亩半地，全家老少没黑夜没白日地干，第二年小麦长得很好。孟府的“君子”们，眼珠一转，就想出了毒计。在庄稼快上场时，硬把地收回去。退给我们的“押金”，只够买一只鸡。俺四大爷望着金黄的麦子，有理没处说，活活气死了。在孟府的残酷剥削下，我们全村一百九十户佃户，被迫逃荒要饭的一百五十六户，卖儿卖女的四十八户，冻死饿死绝了后代的三十八户。看！这就是孟府这伙“君子”统治我们的惨景！

要说“离不开”的话，那些统治压迫人民的“君子”们，离不开劳动人民的“供养”倒是实情。他们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只知道糟蹋我们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说，他们离开我们劳动人民一天也活不下去。就拿孟府来说吧，孟府霸占着一万七千多亩地，有一分一厘是他们亲手开的吗？没有。他们吃的粮食，有一颗一粒是他们自己种的吗？没有，全是从我们贫下中农手里抢夺的。孟府二百多间房子，“君子”们搬过一砖一瓦吗？没有，全是我们劳动人民给他们建造的。孟府还指派什么庙户、林户、洒扫户、猪羊户、挑水户、推磨户、报风、报雨、报雪户等等，强迫劳动人民给他们纳贡服役。孟轲的第七十四代孙孟凡骥，全家不过十口人，却要四十多个佣人伺候。他经常设宴请客，一桌酒席要上好几道点心，一百多样菜，花的钱不计其数。可以看出，那些“君子”们，都是压迫人民的罪人，是专吸人民鲜血的寄生虫。

但是，几千年来，历史一直被颠倒了。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吃不上，穿不上；一小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却过着清吃坐穿、花天酒地的生活。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在历史上没有地位，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小撮反动统治者，却耀武扬威，称王称霸。这真是天大的不合理！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我们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我们就应该做社会的主



人。“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从春秋末期的奴隶造反，到封建社会的大小几百次农民起义，都是对“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这种反动谬论的有力批判，都是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我们邹县一带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明代后期，以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打进了邹县城，横扫了罪恶累累的孟府，杀了孟轲六十代孙孟承光、六十一代孙孟弘略。公元一六四四年到一六六一年（清顺治年间），邹县境内，先后曾有近三十处村寨，组织过大小不同的武装斗争，我们佃户村也竖起了造反大旗。自从有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反抗斗争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一九四五年，邹县第一次解放。我父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乡农救会长。他带领俺村佃户三百多人，开进孟府，造了这个世袭阎王殿的反，把昔日赫赫扬扬的“君子”们打翻在地。可是孟府的“君子”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勾结国民党土匪，向贫下中农疯狂反扑，我父亲和另外两名村干部惨遭杀害。一九四八年，邹县第二次解放。从此，我们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专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政，跟着毛主席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过去被孟府“治”得贫穷落后的野店，现在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粮食产量逐年上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连续八年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社员生活逐年改善，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员住上了新瓦房。过去“圣人门前文盲多”，现在全村适龄儿童都上学，全大队有初中生一百一十二人，高中生四十六人。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比起孔孟的经书来，不知要好过多少倍。劳动人民打倒反动统治者，不但可以生活，而且生活得更好。

我们做主人，是经过斗争得来的。但是，做了主人斗争并没有结束。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鼓吹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不正是孟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种谬论在今天的花样翻新吗？林彪和孟轲，是隔朝隔代不隔心。他拣起孔孟的破烂，作为搞反革命复辟的思想武器，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再拉回到“君子治野人”的黑暗社会。这是白日做梦。我们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批林批孔这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下去，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 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

——批判林彪反对党领导军队的罪行

田 军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反革命的需要，不仅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推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他极力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反对毛主席历来坚持的党指挥枪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林彪关于枪指挥党的谬论，清算他反对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对于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我军建设，对于继续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党和军队的关系，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也不能并列。这是我党我军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基本纲领是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实现这个任务，党必须建设一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风格的人民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根据党的纲领、任务，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是我们党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绝对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正确执行



党的纲领、路线，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全心全意地为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事业，冲锋陷阵，战斗不息，这是我军唯一的准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坚持和发扬了这个光荣传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辉胜利。林彪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妄图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破坏我军的优良传统，改变我军的性质，这是他背叛党、背叛军队、背叛人民的一大暴露。

是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还是反对党的领导，搞枪指挥党，这历来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建军开始，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高饶反党联盟，就曾经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作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手段。我党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中指出：高岗“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自认为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并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继高岗之后跳出来反党的彭德怀，也是妄图搞枪指挥党的。林彪鼓吹枪指挥党，制造军队决定党和政权性质、命运的种种谎言，甚至叫嚷缔造者不能指挥，要由他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其罪恶的目的和卑劣的手法同高岗、彭德怀是一脉相承的。现已查明，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我们同林彪围绕着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所进行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毛主席历来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作用，对反对党领导军队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指出：对于红军，“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井冈山的斗争》），并且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了保证军队正确地执行党所规定的政治任务，毛主席在红军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规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井冈山的斗争》）。毛主席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司令部对外”、“军事领导政治”等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严肃指出：“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领导全党批判了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也批判了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



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谆谆告诫“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战争和战略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又重申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曾经多次明确地阐明了毛主席这个思想。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再次引述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我们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强大思想武器。

党指挥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这个原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自从产生阶级以来，才有了国家政权、政治派别、政党，也才有了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军队。任何军队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都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按照自己阶级的纲领、路线建立自己的军队，把军队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论联合政府》）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对这支军队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他们掌握着政权，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他们总是通过他们控制的反动武装，实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妄图镇压和消灭这支军队；或者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妄图通过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把革命的武装交给他们。在他们失去政权以后，除了阴谋纠集反革命的残余势力，进行反革命暴乱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他们混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来破坏、腐蚀我们的党和军队，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林彪鼓吹枪指挥党的谬论，正是代表了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愿望。

毛主席说过，军事原则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林彪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推行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正是同他推行“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紧密相联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有什



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路线为其服务。在我国历史上，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老二和孟轲之流，为了推行“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一方面竭力宣扬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的“以礼治军”的反动思想，把军队作为奴隶主阶级“存亡继绝，救乱除害”的反动工具，用以镇压奴隶的武装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反抗，挽救奴隶制的灭亡；另一方面又大肆进行所谓“去兵去食”的欺骗宣传，用以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实行的“耕战政策”，妄图阻碍新兴地主阶级用革命的武装来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当作他万事中最大的事，妄图“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天国”，“继”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举”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的“逸民”，这是一条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从反革命的经验中懂得，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他推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大障碍。林彪鼓吹枪指挥党，反对党指挥枪，就是妄图改变毛主席为我党我军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但是，同一切反动派的反动行为总是走向其主观愿望的反面一样，林彪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但没有能够改变我党我军的路线和性质，相反，他自己却成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反面教员。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还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对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林彪反革命谬论一针见血的批判。历史的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才是我军的生命，才是我军胜利的决定因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排斥毛主席正确路线对红军的领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长期以来积聚的革命武装丧失百分之九十左右。长征途中，张国焘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妄图搞枪指挥党，他分裂红军，实行逃跑主义，最后使一部分红军受到严重损失。而每当我们清算了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时候，全党、全军的团结就大大加强，军队就发展，革命就前进。两条路线，两种结果，有



力地驳斥了林彪的谎言，证明了军队能否发展壮大，以及胜败与存亡，都取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或错误。路线正确，没有兵可以有兵，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不正确，有了枪也会丢掉。四十多年来，我们的军队，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南征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英勇地保卫祖国边防要塞、领海、领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就是因为坚持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抵制、批判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的军队对于发展党的组织，建设革命政权，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才得到发挥的。这同林彪鼓吹的枪指挥党的谬论毫无共同之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始终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这正是党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而置于我军肩上的政治任务，是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所要求的。而这些任务的完成，一刻也不能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指导。正是由于我党我军的广大党员、干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和艰苦卓绝的工作，才使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反动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总是妄图通过武装颠覆或“和平演变”的手段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也永远是一个工作队。它既要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也要同不拿枪的敌人作斗争。我军要担负起这样繁重的任务，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只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心明眼亮，斗志昂扬，不被任何拿枪的敌人所压倒，而要压倒一切敌人，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而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先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和广大群众一道，胜利地摧毁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正是由于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结果。林彪在谈军队作用时闭口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就不难看出，其用心并不是为了发挥军队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而恰恰是为了取消和破坏这种作用。然而，这不过是林彪的痴心妄想。通过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我军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必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林彪反对党的领导，充分暴露了他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反动面目，**暴露了**他资产阶级野心家的本质。林彪鼓吹枪指挥党，谬论很多，但是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要由他来指挥军队、指挥党。他不是说缔造者不能指挥，要由他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吗？这就是妄图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他纠合死党炮制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人民，复辟资本主义，并在其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写上要借助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梦想把我国引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林彪的这种反革命野心由来已久。林彪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而又抗拒改造，抱着立党为私的个人野心，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反对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历来不服从毛主席的指挥，在解放战争中，先是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拒不打锦州；后来又对抗毛主席关于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的指示。林彪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脑子里却充满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主义的腐朽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欲望，决定了他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狂热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大肆鼓吹枪指挥党，阴谋篡夺党政军的最高权力，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正是他这种反动世界观的大暴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军历来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是占着主导地位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林彪反党集团这一小撮野心家，阴谋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根本不得人心的，是极端孤立的。党内历次机会主义头子曾经千方百计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都想搞垮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得逞。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只落得仓惶逃窜，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通过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批林批孔，我军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更加奋勇地前进！



儒家的“以礼治军”与林彪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三三二仓库理论小组

军事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并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在历史上，儒法两家之间在军事路线上的斗争，总是同当时的政治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利用反革命的暴力开历史倒车，十分重视反革命武装的作用。他们坚持用孔孟之道治理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军队忠于腐朽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更有效地担负起屠杀和镇压劳动人民的职能。他们推行的反动军事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以礼治军”。林彪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儒家的“以礼治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儒家的祖师爷孔丘，看到周朝“礼崩乐坏”，奴隶制摇摇欲坠，心中急如火焚。他制订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挽回这个局面，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为此，孔老二又为没落奴隶主阶级开出了“以礼治军”的药方。他鼓吹什么：“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主张用“周礼”来治军，使军队成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有力工具。他还反复解释道：“仁者必有勇”，“勇而无礼则乱”。就是说，只有做到“克己复礼”的人，才能为没落奴隶主的利益去作战。如果光有勇，而不以“周礼”为指导，就会“犯上作乱”。把这些反动说教归纳起来，就是：将“周礼”灌输于军队，使军队死心塌地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卖命。

林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妄想开历史倒车，恢复地主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除了在政治上效法孔老二，打起“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破旗外，在军事上也忠实地继承了孔老二“以礼治军”的反动衣钵。他的“以礼治军”，就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腐蚀部队，妄图改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对于



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军队工作，就是要抓党的正确路线的学习。林彪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顽固地提出什么以“四好为纲”来代替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使军队为他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服务。他胡说什么：“军队不抓基层不行，抓基层不抓四好不行。”他那个贴着“四好”标签的所谓“一好带三好”的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呢？林彪所谓首先要抓的“政治思想好”，根本不讲党的正确路线，反对部队学习马列主义，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把他那个所谓“一整套”，什么解决思想问题要“雷厉风行”、什么“六个战术原则”之类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向部队强行灌输。林彪的死党曾经毫不隐讳地叫嚷：“政治思想好的最高标准”，就是以林彪为“榜样”。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林彪的所谓“政治思想好”的反动实质。这样的“一好带三好”，只能带到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林彪满以为他这样一搞，就可以偷天换日，使“军旅有礼”，成就地主资产阶级搞复辟的“武功”了。可是，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照耀下，我军广大指战员始终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胜利前进的，林彪炮制的这一套在广大指战员中是根本通不过的。

毛主席早就告诫全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林彪既然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为“悠悠万事”中的“大事”，效法孔老二“以礼治军”，必然要夺党的兵权，夺人民的兵权。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在东北一再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招降纳叛，扩充实力，拥兵自重，向党闹独立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更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争个人的兵权。他授意他的死党，不论担任什么职务，工作多忙，都要把主要精力用来阴谋抓军权。孔老二不是叫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把政令、军令的大权都集中在奴隶主头子的手中吗？林彪正是学着孔老二的样子，在军事上大搞“正名”，炮制缔造者不能指挥的反动谬论，说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由他“直接指挥”，妄想由他和他的死党“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林彪还加紧组织反革命大、小“舰队”，以作为他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队伍。林彪的这些罪恶活动充分说明，他是一个野心极大的资产阶级大军阀！

历史上的反动阶级和儒家重视军事，把军权牢牢抓在手里，目的就是要用反革命的暴力，残酷镇压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维护和复辟旧制度。对这一



点，汉朝的儒生班固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看！他们就是要把刀架在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头上，达到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目的。儒家讲“仁”，讲什么“去兵去食”，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在儒家的言行中，人们很难把“仁”字和“杀”字区别开来。儒家屠杀人民和杀害有进步思想的人士，是很残酷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揭露过：满篇写着“仁义道德”的历史，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翻开历史看一看，凡是孔老二及其门徒大唱“仁”字高调的时候，也正是他们手挥杀人刀，残酷镇压革命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时候。那个被反动阶级捧为“仁者爱人”的“至圣先师”孔丘，就是儒家屠杀人民的元凶。当郑国的子大叔在“萑苻之泽”把起来造反的奴隶“尽杀之”以后，孔老二立即欣喜若狂地大叫道：好啊！对老百姓太宽了，老百姓就要闹事，闹事就狠狠镇压（“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儒家的“亚圣”孟轲同样是一个刽子手。他平时装得连杀牛羊都不忍心看，可是，一到他看见或听到谁反对“克己复礼”，就马上凶相毕露地力主“征伐”。他竭力鼓吹诸侯一次不来朝见周天子就降低官职，两次不来朝见就削减封地，三次不来朝见就发重兵剿灭。他还叫嚷：“善战者服上刑”，要把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中善于对奴隶主阶级作战的人处死。真是凶残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人民公敌蒋介石在这方面所讲的和所做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诬蔑为“匪”，把发动反革命内战、对革命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说成是“仁”，胡说什么“剿匪就是行仁”。就在这面“仁”字的破旗下，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接着在全国各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革命群众开枪。三、四年内，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

林彪搞“以礼治军”，与党争兵权，其险恶居心就是妄图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为他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林彪不是抽掉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说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吗？今天，我们把他这些黑话同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对照起来看，那就再清楚不过了。他要解放的是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他要“镇压”的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但是，这只不过是林彪的痴心妄想！**“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广大指战员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铁拳砸得粉碎！



儒家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搞“克己复礼”，镇压革命人民，往往要同国外反动派相勾结。“以礼治军”的军事路线，实质上也是一条卖国投降的军事路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就是借助洋枪洋炮屠杀中国人民的卖国贼。在西方列强对我国大肆侵略的时候，他不但不作任何抵抗，而且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屠刀对太平军进行血腥的“讨伐”。他公开说：“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兵亦诸道并进”。他的门徒李鸿章甚至叫嚷：洋兵“往往破贼，而不能多杀贼，故须我军偕作，以辅其力所不逮也”。这是何等无耻，何等疯狂！他们依靠外国侵略军队的淫威，成千成万地杀人。天京被攻陷后，他们自己供认，三天之内就杀了十几万人，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

林彪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搞“以礼治军”，决定他必然要同国外敌人相勾结。他把孟轲的“小国师大国”写成条幅挂在黑窝里，当作座右铭。在《“571工程”纪要》中，他妄图和苏修里应外合，借助苏修的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把我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失败后，又私乘飞机，投奔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实证明，林彪也是为搞复辟倒退走上叛国投敌道路的大卖国贼。如果林彪真的实现了依靠苏修充当儿皇帝的迷梦，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就要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就要重新沦入苦难深渊。然而，“蚍蜉撼树谈何易”。林彪及其死党毕竟是脱离人民的、极端孤立的一小撮反动派，他们的阴谋活动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反对，因而注定不能得逞，其结果，比历史上的反动派失败得更惨。

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军事上的表现，就是由那个阶级掌握枪杆子，用什么政治路线统帅枪杆子，枪杆子为什么政治目的服务的问题。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现在，林彪虽然已经自取灭亡，但是，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并没有彻底肃清，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这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我们每个革命战士的根本任务。



揭穿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某部六连党支部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的开展，我们连队在批判林彪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结合研究儒法军事思想斗争的历史，深入批判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批判过程中，我们通过剖析林彪的罪恶历史和他对抗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作战方针的罪行，揭露了林彪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剥掉了他的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教导我们：“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为了剥掉林彪所谓“常胜将军”的画皮，我们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在我军历史上各个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的有关著作和论述，然后翻阅有关资料，找出林彪在这些历史关头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运用对比的方法，弄清毛主席是怎样指示、怎样部署的，林彪是怎么说、怎么干的。这样，就使林彪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一贯右倾的原形毕露。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林彪却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怀疑革命，看不到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之可能，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为此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以后，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篇通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是历史的真象。可是，林彪竟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他没到过三湾，却标榜自己对“三湾改编”有功；明明对革命悲观动摇，却书写“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反动诗词，妄图翻历史的案。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又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写反党文章，吹捧人民公



敌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对毛主席提出的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拥护叛徒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蒋介石有“和平诚意”，声称愿同蒋介石在东北“合作”。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他一再抗拒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战略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林彪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英明决策。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攻击我党对苏修所进行的原则斗争是“做绝了”，妄图向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妥协投降。为了加深认识，我们还请了两位老红军作报告，揭发批判了林彪在长征途中伙同彭德怀反对毛主席，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他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的罪行。历史事实不容颠倒。把林彪历史上所犯的右倾错误，同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卖国投修的无耻行径联系起来，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林彪决不是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道道地地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的历史根本不是什么“常胜将军”的历史，恰恰相反，乃是一部右倾、投降卖国的罪恶史。

为了进一步揭穿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丑恶面目，我们还组织全连同志分析我军战史上的典型战例——辽沈战役，从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角度，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

毛主席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胜利。这次战役从准备到结束，一直存在着两种军事思想、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在分析这次战役时，我们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和一系列重要指示，然后运用辽沈战役形势图，采取讲课辅导的方法讲解辽沈战役全过程。接着引导大家联系辽沈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

一是从战役前对政治军事形势的不同估量，选定决战时机来分析对比。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全面而精辟的分析，看出了决定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决战时机已经成



熟，英明果断地下了同敌人实行战略决战的决心。而林彪却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怕这怕那，顾虑重重，对抗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很长一段时间将东北我军主力部队徘徊于长春与沈阳之间，拒不南下。这完全暴露了他消极避战的右倾机会主义面目。

二是从战略主攻方向的不同选择来分析对比。毛主席根据当时东北战场我军的有利条件，明确指出主攻方向应在北宁线，“**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主席提出的我军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然后加以各个歼灭的方针，是东北战场作战唯一正确的方针。而林彪却违背全局利益，对抗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胡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提出首先攻打长春，把我东北主力留在北线作战的荒谬主张。这充分说明他丝毫没有战略头脑，是一个害怕打空前未有的大歼灭战的胆小鬼。

三是从作战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那里来分析对比。毛主席全局在胸，明确指示必须把中心注意力放在锦州作战方面，集中兵力，首先攻克锦州。因为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战场的战略要地，是敌人的致命弱点，拿下了锦州就可以关门打狗，置敌于死地。可是，林彪在辽沈战役的序幕揭开以后，又想避开锦州，一会儿想打山海关，一会儿想回师去打长春。这充分说明林彪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作战方针，看不到先打锦州对全局的重大意义，反而一意孤行，竭力对抗毛主席的作战方针。

四是从要不要全歼敌人的问题上来分析对比。当我军攻克锦州切断北宁线以后，营口便成了敌人从海上逃跑的唯一退路。毛主席曾多次急电林彪，命令他派部队堵住残敌退路。而林彪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拒不派兵控制营口，结果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这充分暴露了他反对打歼灭战、主张打击溃战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有力地说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不是“作战有功”，而是犯下了放敌南逃的大罪。

通过这样的分析对比，同志们更加认识到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正确和毛主席作战指挥的英明，进一步认清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革命的危害。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在斗争实践中体会到，水有源，树有根，要彻底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进行分析。我们组织大家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研究儒法两家在政治、思想、军事上斗争的历史经验，深挖了林彪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根源，认识到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孔孟之道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毛主席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历史上，儒家宣扬“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谬论，也顽固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这就注定他总是高估反动派的力量，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对抗毛主席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陷入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军事科学，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林彪信奉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决定他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林彪鼓吹的所谓战术原则，是形而上学的死板教条，是儒家“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的翻版。他的“六个战术原则”，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机械论的大杂烩，完全是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

经过学习和批判，使干部战士深刻地认识到，林彪在政治上效法孔老二，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在军事上必然效法儒家“以礼治军”，妄图用孔孟之道破坏我军建设，改变我军性质。林彪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常胜将军”，是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以达到他改变党的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搞复辟、投降卖国的反动派，决没有好下场，林彪也不例外。

通过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推动了连队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决心继续认真学习，努力作战，把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批深批透，彻底肃清其流毒，使连队永远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连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某部四连党支部

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这是林彪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批林批孔运动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连队在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过程中，重点批判了林彪这一罪行。

为了掌握好思想武器，我们首先组织全连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在这部光辉历史文献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建党建军方面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强调了“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同志们通过忆历史、看现在，深有体会地说：我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战斗历程，就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了无数险滩暗礁，战胜了阶级敌人的反抗和错误路线的干扰，几经曲折，转危为安，直到夺取全国的胜利，靠的正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毛主席又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照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灯塔，是全国军民的生命线。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夺取了党内外一个个斗争的伟大胜利；我军也在这些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和锻炼。斗争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抓党的路线学习和教育。讲路线，就要讲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军建设的头等大事，抓住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就能纲举目张。广大指战员只有在斗争中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真正提高路线斗争觉悟。



在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路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以后，我们引导同志们瞄准靶，放好枪，有重点地深入批判了林彪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的谬论。林彪用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胡说什么，进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是地方干部的事情”，“只要两个小时就行了”。这是林彪反对部队进行正确路线教育射出的第一支毒箭。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这是毛主席对党内历次路线斗争所作的科学总结。毛主席把路线斗争、路线教育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反复深入地向广大工农兵和其他革命群众，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志们十分气愤地批判了林彪的谬论。他们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心中有鬼，最害怕党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群众所掌握。毛主席教导我们对路线问题要经常讲、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叛徒、卖国贼林彪却叫嚷“只要两个小时就行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对路线问题要使广大革命群众包括我军广大指战员都知道，而林彪却说“是地方干部的事情”。这完全是别有用心胡说八道！林彪散布这些谬论的实质，就是妄想使我军脱离从古田会议以来毛主席亲自奠定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轨道，妄想把毛主席、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我军路线政策教育，同地方的路线政策教育割裂开来。如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去教育部队，就象汽车没有了方向盘，钢枪没有了准星，战士没有了主心骨一样，我军必然会失去无产阶级的革命灵魂，偏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里，林彪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反对用毛主席革命路线教育部队的狼子野心。

接着，我们又组织干部战士回顾了连队的成长史，来加深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连队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中，由于经常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贯注于士兵之中，激发了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干部战士有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心明眼亮，英勇善战，在战争中曾经以少胜多，屡立战功，获得了上级党委授予的“能攻能守”，“顽强果敢”等光荣称号。全国胜利以后，我们不断组织全连同志学习古



田会议决议，经常进行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传统的教育，较好地完成了行军、训练、执勤、施工等项任务，受到了人民群众和上级的赞扬。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连同志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投入战斗，在斗争中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错了就丧失一切。路线问题，是决定革命成败、军队性质、建军方向、为谁服务的头等问题。路线觉悟，是革命战士的根本觉悟。有了这种觉悟，就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为人民而战，粉身碎骨也心甘！有了这种觉悟，就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不断立新功。

林彪反对用正确路线教育部队，还鼓吹什么“政治教育”要抓“活思想”、“活教育”。这是林彪射出的又一支毒箭。

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著作中强调指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为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体会，部队一定要把进行政治路线的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又进一步强调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号召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保证。只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把思想政治路线搞正确了，进行各项具体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才能找到正确的办法。林彪猖狂反对部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离开阶级分析去讲抓“活思想”、“活教育”，这就有力地说明他仇视和反对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一方面，他竭力混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原则界限，否定对各种思想倾向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否定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妄想以突出他那一套资产阶级政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社会主义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教育。另一方面，他又竭力混淆党的路线教育与解决战士具体思想问题的界限，否认政治教育首先应着眼于提高人们的路线觉悟，妄想以所谓抓“活思想”，来冲



击、代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战士们指出，林彪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在部队思想建设问题上抛出这一套私货，用心十分恶毒。什么抓“活思想”，难道世界上还有死思想？林彪整天“抓”过来，“抓”过去，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把部队引到只抓鸡毛蒜皮这些小事的邪路上去，而忘记革命路线这个大事，丢掉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使整个部队的工作提不起纲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是在建军问题上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重要标志，是区别毛主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原则界限，是关系到我军性质的根本问题。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党指挥枪”**的原则，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设军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广大指战员中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批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只有这样，才能激发我军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保持我军无产阶级的性质，使我军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担负起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战士们说得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我军一直占主导地位，广大指战员同全国人民一样，热爱毛主席，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林彪破坏我军建设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按照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对党员和非党员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这一运动看成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极好时机，把它作为向全连干部战士进行路线教育，提高路线觉悟的最好课堂。党支部成员带头学，带头批，并组织全连同志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奴隶出身的彝族战士，也登上了宣讲儒法斗争史的讲台，全连有五名战士，先后在地方党委和上级机关组织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发了言，战士理论队伍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茁壮成长。党支部的思想、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全连军政素质不断提高，指战员正在能文能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湖南岳阳县毛田公社党委会

我们毛田，解放前叫“茅田”。那时候，“山是剥皮山，水是祸害水，土是挂壁土，田是沙洲滩”。好年景，亩产也不过两、三百斤。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毛田的面貌完全变了样。三万五千亩荒山造上了林，百分之九十八的农田基本上实现了旱涝保收，五百多亩沙洲改造成了良田。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的一倍半，亩产达到一千多斤。集体储备粮不断增多，社员生活逐年提高。多种经营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很大发展。

我们公社，范围不算大。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有十五个农业大队，有社办企业，还有文教、卫生、财贸等项事业。工作千头万绪，究竟怎么抓，抓什么？我们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坚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只有这样，集体经济才能日益壮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不断巩固。我们公社有两个自然条件同样好的大队，过去生产都比较落后。一个大队以大寨为榜样，狠抓两条道路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多斤。而另一个大队却不是这样，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没有及时打击，对资本主义倾向没有坚决批判，而想通过一些简单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后进面貌迟迟不能改变。事实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农业生产，社队企业，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都有一个方向问题，路线问题，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社会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就抓住了根本，各项工作就能提起纲来。离开了这个根本，不光生产抓不上去，工作做不好，还会偏离正确方向，甚至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毛主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的教导的认识。在各项工作中，我们就比较自觉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我们经常组织贫下中农讲家史、村史、队史，进行新旧两个社会制度的对比，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比，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对比，联系农村实际，揭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鼓舞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一九七二年，我们公社遇上百年未有的干旱，一小撮阶级敌人散布什么“人要害人天不肯，天要害人草不生”，“大灾临头，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谬论，煽动资本主义倾向。少数干部也产生了悲观情绪。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依靠集体经济战胜灾害，还是搞歪门邪道？广大贫下中农回答说：“越是困难，我们越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越要坚持斗争哲学”。大家揭露批判阶级敌人破坏抗灾斗争的罪恶阴谋，针锋相对地提出：“斗天斗到天低头，天不低头誓不休”。全公社男女老少齐上阵，斗志昂扬，日夜奋战，大灾之年夺得了丰收，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社员们说：“抗灾斗争的胜利，就是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

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善于引导群众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果不把界限划清楚，就容易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比如说，在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不分清方向、路线，认为只要给群众一些物质利益，就能调动群众积极性。有的队甚至把集体的地暂时借给社员种油菜，搞“小秋收”。这样做符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群众，提到两条道路



斗争的高度进行分析讨论。大家认为，积极性有两种，搞“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不可能调动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相反，会腐蚀人们的思想，助长资本主义倾向，削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靠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靠政治思想工作来调动。通过分析讨论，干部划清了是非界限。过去，在农忙季节，有的干部采取提高工分来“刺激”群众积极性；现在生产越忙，越抓紧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近三年来，全公社社员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平整土地一千五百多亩，新建小水库十二个，整修山圪一百二十多个，改修大小排洪圳四千多条，修建排灌渠道一百二十多里，在沙害严重的地方还修筑土、石谷坊三百多个，沉沙池六千多个。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总和的五倍。

深入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从根本上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界限。我们在政治夜校开设了基本路线教育课，联系本地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实际，编写基本路线教材，向群众宣讲。把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同学习党的政策结合起来，同深入开展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结合起来，使基本路线的教育经常化。群众掌握了党的基本路线，就有了分清两条道路的是非标准，就能坚持正确的，抵制错误的。道云大队梅树生产队去年在订种植计划的时候，有人认为药材收入高，种粮不如种药材，提出要压缩粮食生产的面积，多种药材。但是贫下中农不同意，他们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情，都要想到国家，想到社会主义。只图小集体多赚钱，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助长资本主义”。干部群众批判了“以钱为纲”的资本主义倾向，按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按照先国家、后集体的原则，落实生产计划，保证了粮食生产面积，同时利用山坡地，适当种了一些药材。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在种植计划上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公社粮食生产的面积扩大了六百多亩，多种经营也增加到二十多个项目。

划清两条道路的界限，还要根据各项工作的特点提出问题。社办企业，是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还是只图赚钱？农村商业是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引下，从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需要出发，还是片面追求利润指标？农村教育要不要贫下中农管理，是不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人材？农村卫生工作方



面要不要办合作医疗，是不是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等等。这里都有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界限清，方向明。由于我们发动广大群众划清了这些界限，全公社的各项工作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公社农机厂以修配农机具为主，平时随到随修，农忙组成支农小分队，服务到田间，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商店根据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需要积极组织货源，搞好收购，农忙季节，增加服务项目，延长服务时间，经常出货郎担，送货上门，努力改进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卫生院医务人员深入到生产队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帮助大队培训赤脚医生，发展中草药，为巩固合作医疗贡献力量。学校在贫下中农管理下，实行开门办学，经常组织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林批孔，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着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为着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积极发挥作用。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必须重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认为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上边的事，农村干部管不管关系不大，是不对头的。我们和干部群众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回顾和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清楚地看到，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经常利用孔孟之道来进行破坏活动。比如，我们发动群众开展农田基本建设，阶级敌人就散布“龙脉”、“风水”一类的迷信思想；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阶级敌人就散布“天命论”，妄图动摇我们战天斗地的决心；在我们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时候，阶级敌人就利用“乖人赚钱，蠢人种田”，“人不出门身不贵”等旧观念，煽动劳力外出，搞副业单干，等等。而我们的每一次胜利，正是由于批判了阶级敌人散布的孔孟之道取得的。这就说明，农村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只有坚持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发动广大干部群众，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揭露和批判了阶级敌人利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腐蚀人们思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罪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干部群众深入学大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团结战斗，赢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今年全公社早稻一季平均亩产达到七百



多斤。

为了推动批林批孔深入、持久、普及地进行下去，我们注意发挥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以及农村学校师生的积极作用，组织他们和贫下中农、农村干部相结合，开展社会调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带动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目前，全公社正在出现一个男女老少齐参战，田头屋场摆战场，队队办大批判专栏，家家写大批判文章的热烈景象。牟楼大队白坳生产队二十多名妇女，在女生产队长的带领下，联系实际召开了二十多次批判会，写了九十多篇批判文章。她们通过批判孔孟之道“男尊女卑”和林彪诬蔑妇女的反动谬论，主人翁的精神大发扬，立志顶起“半边天”。今年来，她们和本队的部分社员、学生一道，垦山造林十多亩，改造了三十多亩冷浸田，新建了一个大山塘，还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开山造田三亩多，用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

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在群众中涌现出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热情扶植和支持这些新生事物，用新的东西去战胜旧的，代替旧的东西，才能使社会主义思想牢固占领农村阵地。同心大队的青年们针对阶级敌人利用旧小说、旧山歌、旧故事腐蚀社员群众的破坏活动，经常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全大队出现了二十多个故事员。他们在田间地头和政治夜校，通过讲故事宣传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表扬“农业学大寨”中的新人新事，很受社员群众欢迎。我们总结推广同心大队的经验，建立了三十多个革命故事小组。全公社一个用新思想、新文化代替旧思想、旧文化的生动局面正在形成。现在，队队办起了政治夜校，部分生产队还办了图书室，干部群众学政治、学文化，讨论国家大事；群众性的文艺宣传队，利用工余时间活跃在田头屋场，演革命戏，唱革命歌，宣传毛泽东思想，表彰新人新事；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广泛开展，青年、民兵，劳武结合，练思想，练本领；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婚嫁喜庆，不要彩礼，不办酒席，不搞铺张浪费；讲科学，破迷信，不信天命信革命，遇灾害病不求神，队上死了人，开个追悼会。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发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越来越巩固。

在开展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我们有经验，也有教训，既尝到过甜头，也吃过苦头。我们决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带领广大群众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执行正确路线 夺取小麦高产

——河南新乡地区的调查报告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新乡地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小麦获得了大面积、大幅度增产。今年，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战胜了持续的严重干旱，小麦产量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近五百万亩小麦，平均亩产四百斤以上，一季跨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单产和总产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都增长近两倍。

新乡地区小麦增产的事实，又一次说明了革命是推动生产的动力。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生产条件就可以得到较快的改变，从而加速农业发展的步伐。

新乡地区是小麦集中产区。历年来小麦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复播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争取小麦增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自然面貌改变不大，小麦亩产长期徘徊在百斤左右。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黑货，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小麦产量逐年提高，并出现了一批亩产四、五百斤的社、队。这些高产单位的事实，教育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业增产潜力是很大的。既然一个队、一个社的小麦能够高产、稳产，为什么不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以较快的速度实现平衡增产呢？

但是，在这个问题面前，人们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有的说：“人家的经验好是好，咱没条件学不了”；有的认为，一些社、队的产量高，是因为“风调雨顺”；有的则认为“只要把生产措施学到手，就可以了”。总之，他们认为一个队、一个



社可以办到，一个县、一个地区是难办到的。为了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地委分析和回顾了全区农业发展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并发动各级党组织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联系实际，总结了一些基层单位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实现小麦高产的经验。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认真学大寨、夺取粮棉双高产的事迹，给大家以很大启发。七里营公社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亲临视察过的先进单位。这个公社地处黄河故道，过去是沙荒、盐碱、茅草窝，旱、涝、碱、沙为害严重，多灾低产。建立人民公社后，生产逐年发展，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给他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鼓舞了斗争的信心。十几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以大寨为榜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针锋相对地同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面貌。全公社一万八千亩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八千亩沙岗得到了治理，**开挖整修渠道**八百多条，打成机井近五百眼，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保丰收。一九七一年粮食亩产超过千斤，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展现出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蓬勃景象。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走毛主席指引的大寨道路，好比吃甘蔗，上楼梯，节节甜，步步高。”七里营公社的经验在全区推广后，广大干部、群众从对比中进一步认识到，发展生产的决定因素不是自然条件，也不是什么生产措施，根本在于是否坚决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要走大寨的道路，就必须从路线上找差距，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搞对头。

阶级斗争是农村中存在着的活生生的客观现实。社会主义时期，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始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事实证明，一些小麦高产的社、队所以能够持续前进，就是因为他们比较自觉地抓住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断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些社、队步子迈得不大或长期踏步不前，主要是由于没有抓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为了使大家清楚地认识现实阶级斗争的状况，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新乡地区地、县两级党委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分期分批组织力量，深入到一些比较后进的社、队进行调



查研究。温县赵堡公社的赵堡大队和西水运大队村连村，地连地，条件差不多，可是赵堡大队亩产小麦九百多斤，西水运大队却只有二百八十斤。是西水运大队条件差吗？不是。社员说：“差就差在路线上。”原来西水运大队领导班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方向道路不明，阶级敌人乘机煽动资本主义倾向，社员对搞好集体生产没有信心。后来在县委帮助下，对这个队加强了领导，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副业单干等资本主义倾向，坚定了干部、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经过几年努力，今年小麦亩产达九百多斤。

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资本主义倾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严重障碍。那些步子迈得不大或长期踏步不前的社、队，不是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高，而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还没有肃清，干部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因而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受不到打击，资本主义的活动还有市场。各级党组织在回顾和总结中体会到，过去后进社、队的面貌改变得不快，就是由于没有抓住这个要害。不论抓先进，还是抓后进，都必须紧紧围绕解决方向道路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识别、抵制修正主义路线的能力。后进社、队的阶级斗争比较复杂，客观物质条件暂时也差一些，但应该首先看到，这些社、队的贫下中农有着强烈要求改变面貌的愿望，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潜力很大。后进社、队上去了，可以更好地促使先进的更先进，中间的赶先进。近几年来，这个地区各级党组织把抓后进提高到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来认识，着重抓了这些单位的转化工作。农忙季节，全区有上万干部深入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劳动。新乡、温县、沁阳等县，近几年抓了一千多个后进队的工作，使先进单位的经验更好地在面上得到推广。这样就使后进面不断缩小，先进面不断扩大，促进了小麦大面积的平衡增产。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抓住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们认为，要大干社会主义，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不行。经过几年奋战，现在全区麦田可灌溉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每亩平均施粗肥四方，氮、磷肥七十多斤，百分之九十的麦田进行了深翻改土，基本实现园田化。这些条件为今年小麦一季上《纲要》创造了物质基础。在生产斗争中，同样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寨的英雄业绩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靠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干苦干，干出来的。学大寨，就要学路线，就要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大干社会主义，要有敢于做大自然主人的革命英雄气概。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人们头脑中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的束缚，有的干部总是强调客观困难，缺乏雄心壮志，认为山区土薄石厚缺水源，低洼盐碱地区涝了淹，旱了碱，要想增产难上难。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复批判了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天命论”，广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因循守旧、修修补补，实际上是怕苦怕累的懒汉懦夫世界观的表现。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松松垮垮改变不了面貌。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办好集体经济，就得不靠“天命”靠革命，迎着困难向前闯。

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对自然条件的看法也就大不相同，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山区的干部认为，修水库有山沟，修田垒岸有石头，造水泥、烧石灰，原材料就地有。沙碱地区的干部认为，沙岗植树造林，可以变“银行”，盐碱洼地治碱改土，可以变粮仓。加速改变生产条件成为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许多县、社积极制订了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重新安排河山的规划。地处山区、丘陵的辉县，在重新安排河山的斗争中，通过反复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罪行，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狠狠批判了阶级敌人在水利建设中散布的“挖断龙筋，一辈子受穷”等反动谬论，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广大干部、群众信心百倍地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天上掉不下来，别人送不来，只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干苦干才能干出来。他们治山治水，采取蓄住天上水，引出沟泉水，挖出地下水，截住潜流水，提水上山岗的办法，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山区每人七分大寨田，今年小麦一季上《纲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经发挥出来，过去较长时间才可能办到的事情，现在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可以办到。原阳县原武公社，过去是“无雨白茫茫，有雨水汪汪”低洼易涝的重盐碱区。曾经有人断言，除了移民、逃荒、种苇子，没有别的出路。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干部群众批判了这种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掌握了治碱治水的规律，大干苦干，采取引黄淤灌、改造盐碱、稻麦两熟的办法，使老碱窝变成了米粮仓。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较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翻了四番。几年来，全区每年冬春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百多万人，四年间共完成土石方两亿三千多万方，使水



浇地面积较文化大革命前扩大了一倍，实现了每人一亩二分水浇田，有力地保证了大面积小麦高产稳产。

根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最近几年新乡地区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迅速发展起来的地方“五小”工业，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地方工业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实质上也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地方工业的发展，对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工农联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才能很好地发挥工业支援农业的作用。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尚未肃清，追求利润和贪大求洋等错误思想经常冒出来干扰。有的机械厂在开始时，坚持修、改、造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比较主动，一旦逐步发展起来，就往往重制造、轻修理，偏离为农业服务的轨道。对这种情况必须警惕。为此，新乡地区抓紧了对工业部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及时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使工业支援农业的自觉性越来越高，绝大多数工厂为支援农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全区从制造排灌机械入手，普遍建起三级农机修造厂，为四万八千多眼机井配套，还发展了水泥工业，保证了打机井，修渠道，建水库的需要。同时，为了解决原材料问题，建起了小钢铁厂和小煤矿；县县还办起了小氮肥厂和小磷肥厂。济源通用机械厂等许多单位，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生产了大批水利机械供应农村，并经常组织农机检修队，肩挑工具，深入田间、井台检修机具，传授技术。延津、孟县等机械厂为支援农业，甘当“配角”，生产急需的农机配件，为农业机械化服务，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

新乡地区每年种植小麦近五百万亩，现在发展还不很平衡。进一步充分发挥和组织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挖掘生产潜力，实现小麦和粮棉更大的增产，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今年以来，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对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以及孔孟之道的批判，进一步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他们在总结今年小麦增产经验的同时，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教导，决心继续前进，为争取小麦更大增产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作出更大努力。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调查组



为革命多出煤

开滦煤矿唐家庄矿党委会

我们矿已经开采了半个世纪。一九六二年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曾经断定矿井面临衰亡，全矿的日产水平一年要减少一千吨，进入七十年代就得收尾关矿，结果挫伤了职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煤炭产量逐年下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全矿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使老矿又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八年来，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共增产煤炭一百多万吨，相当于一座大型矿井一年的产量。批林批孔又开创了新局面，现在的一个唐家庄矿的产量，已经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两个唐家庄矿了。

回顾几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要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敌人和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或者用生产来压革命，或者通过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因此，在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在我们唐家庄矿，这种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是不是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这是检验我们路线斗争觉悟高不高的一个标志。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是对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的科学总结，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条根本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就能使革命不断前进，生产步步上升。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比较好，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抓了路线，比较自觉地坚持了这个方针。

几年来，我们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实践中，经常遇到如何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在生产任务紧张、被动时，往往注意抓生产，忽视首先抓革命、用革命来统帅生产；而当政治运动来了，又容易产生忽视用革命促生产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常常反复出现。为了正确理解和处理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我们经常组织干部群众联系实际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一九五七年，经过整风反右斗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煤炭生产的迅速发展。经过大跃进，我矿跨入了全国煤炭系统的先进行列。一九六二年以后，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只管生产，不抓革命，几个党委书记分工抓掘进，抓回采，抓运输，但因为路线不对头，越抓越被动，煤炭产量逐年下降。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端正了办企业的方向，广大职工进一步提高了路线觉悟，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涨，党委注意把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及时地组织起来，解决好生产环节问题，使得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革命和生产是对立的统一，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首先把领导的思想路线搞正确，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折衷主义。

列宁在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时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一个企业的党组织需要管的事情很多，但是，任何情况下都要把革命摆在首位，在形势好、工作顺利的情况下，要注意把革命放在首位；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要坚定不移地把革命抓好。一九七二年底，正当全矿即将完成全年增产计划的时候，开滦煤矿有两个矿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给完成全年国家计划带来了很大困难，我矿



广大职工为了保全局，主动提出再增产两万吨。我们按群众的意见修订了增产计划。时间紧，任务重，是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还是放松革命只抓生产呢？当时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党委及时地用过去不抓革命、生产倒退，抓革命、生产跃进的经验教训来统一大家的思想，坚持把革命放在首位，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抓大事，促大干，同时，加强对生产的领导，结果，不仅完成了新的增产计划，还超产八千六百吨。

今年以来，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开始有些同志认为运动来势这么猛，声势这样大，担心运动会影响生产，对年初党委制订的提前一年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翻一番的计划，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思想，我们首先组织党委成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批林批孔的指示，使大家明确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上层建筑领域里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必将对经济基础产生深刻的影响。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广大职工的路线觉悟提高了，就能激发出巨大的智慧和力量，生产任务一定会完成得更好。认识提高以后，我们坚持把批林批孔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运动，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广大职工群众的责任感不断提高，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断增强。在集中精力抓好批林批孔的同时，对生产也进行了统筹安排。研究制订了提前一年实现产量翻一番的具体措施，详细分析了实现产量翻一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关键问题，发动群众抓大事攻难关，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在批林批孔中激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工人们说：“林彪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大干社会主义。”干部群众更加自觉地把提前实现产量翻一番计划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联系起来。大家说：产量翻一番是开滦广大工人和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为了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步伐提出的。林彪一伙越是攻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越要鼓足革命干劲，坚决用大干、苦干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全矿掀起了新的生产热潮，原煤产量创造了我矿早采历史的最高水平，提前一个月达到了翻一番的水平，并



从三月份以来月月巩固住翻一番的水平。工人们说：路线搞对头，生产一步一层楼；煤炭产量实现翻一番，是我们批林批孔的物质成果，也是对林彪、孔老二的有力批判。

我们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实践中，还体会到，抓革命必须紧密联系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联系生产领域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通过抓革命，不断端正办企业的方向路线，解决好发展生产的根本问题。这样才能够抓了革命促了生产。因此，从批林整风以来，我们注意把办企业的方向路线问题作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比如在社会主义企业里，靠什么来发展生产，是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还是靠“物质刺激”？这是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重要问题。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对“物质刺激”进行过深入批判，但是，有的同志并没有完全从路线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注意抓住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的错误思想，联系本单位两条办企业路线斗争的历史，来解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许多同志说：靠奖励去刺激群众的积极性，这不正是中了孔老二“小人喻于利”的流毒吗？刘少奇和林彪竭力鼓吹“物质刺激”，就是想用金钱腐蚀工人阶级，把我们引向修正主义邪路，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回击刘少奇、林彪的反动谬论。青年快速掘进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打响了快速进尺的硬仗，今年两次实现了单孔全煤月进一千八百米，创造了全国快速进尺的先进水平。工人们豪迈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最高月进尺只有七百零八米，现在我们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掘出了一千八百米，充分体现了“鞍钢宪法”的巨大威力。

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众。不仅要依靠他们干，更重要的是依靠群众管路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经历一个认识过程的。在老矿挖潜过程中，由于产量不断提高，原有提升能力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始，我们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提出了一个搞水力提升的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国家调拨一些设备，投资大，见效慢。方案提出以后，我们就想发动群众干，可是群众却贴出了大字报，指出这个方案不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是少慢差费的。他们建议把原来在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封闭了的一个提升井恢复起来。这样做的结果，由于利用原有井筒和设备，投资少，见效快，只用二十三



天，花七万元就投入了生产，比我们原设想方案缩短一半时间，少花十几万元，每年加大了三十五万吨提升能力。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大，使我们认识到广大煤矿工人，尤其是老工人，常年战斗在煤海里，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高度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的工人说：“党是我的妈，矿是我的家。要听党的话，管好我的家。”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许多老工人二十几年不缺勤、不误点，兢兢业业为革命多采煤；同时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人。广大工人是革命和生产的主力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首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依靠他们把好路线关。从此，我们建立起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组织，经常召开有老工人参加的三结合会议，研究革命和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去年，我们矿一座续建井要投产。按照常规，需要增加一批新工人，当时不能及时补充。是消极等待还是积极挖掘企业内部潜力？我们发动群众讨论，工人们建议采取兼（兼职）、并（合并同工种）、减（减少辅助工）、代（以弱代强，以女代男）的办法，不仅调整出了新井投产需要的人力，而且进一步调整了劳动组织，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洗煤厂在抽出一部分工人支援新井后，不但没有影响生产，反而促使他们改进了旧的工艺流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为革命抢困难，挑重担，每年都主动要求增加生产任务。群众干劲越大，我们越注意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要注意抓好安全生产。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安全与生产发生矛盾时，我们首先抓好安全。去年九月份，我矿新投产的一个工作面，地质条件发生变化，威胁着安全生产。我们首先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不安全的问题，克服那些不安全因素，虽然产量暂时受些影响，但随着工作面条件的改善，工人的生产情绪更高，煤炭产量也随着大上。

抓革命，促生产，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广大工人说得好：革命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生产要年年促，月月促，天天促。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努力发展煤炭生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 国际述评 ·

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揭穿苏修所谓“天然盟友”的假面具

南 景

前不久，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歪曲事实，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神话，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给发展中国家“以援助和支持”的方针。但是，听其言，观其行，苏修对第三世界贪得无厌的掠夺与剥削，是任何动听的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苏修头目装腔作势的自我表白，只能是越描越黑，欲盖弥彰。

五十多年前，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和基本特征，指出了垄断资本进行对外扩张的必然性。今天的苏联，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苏修必然要对外争夺原料来源，争夺投资场所，争夺销售市场，争夺世界霸权；决定了它不可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真正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它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口头上喊“支持”，暗地里搞破坏。苏修的自我暴露，使人们越来越看清楚，它根本不是第三世界的什么“天然盟友”；而是象第三世界的舆论所揭露的，“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是“按照一个超级大国的野心和阴谋行事”的。

苏修为了标榜自己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经常把所谓“援助”挂在嘴边，抓住一切机会来自卖自夸。好象这样一来，就足以掩盖它以强凌弱，以大压小，损人利己，到处伸手的行为，就足以使人相信它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但是，苏修这种所谓“援助”，无论就其目的、手段，还是后果来看，都恰恰证明苏修是一个口蜜腹剑、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



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外掠夺和剥削的时候指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现象，又是跟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政治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势力范围密切联系着的。这就不仅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追逐超额垄断利润的剥削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对外扩张，而且指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正是为了在地球上瓜分势力范围，争夺世界霸权。苏修搞的所谓“援助”，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只不过苏修输出的资本加盖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标记罢了。

苏修在第三世界搞的所谓“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都是从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的。苏修的“经援”，实际上是利用第三世界国家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枷锁，发展民族经济的强烈愿望，通过贷款、投资等方法，对受“援”国进行经济渗透，控制要害经济部门，**掠夺**自然资源，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把受“援”国变成它的政治、经济附庸，从而加强它在争夺世界霸权中的地位和实力。

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罪恶时曾经指出：“**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今日苏修的资本输出，则是用一笔“援助”，进行四层剥削：第一，它从贷款中直接榨取利息，如印度现在每年偿付给苏修的旧债利息和利息的利息，要比它同年获得的新贷款数额高出四分之一。第二，受“援”国必须用贷款高价购买苏修的陈旧设备和积压物资，苏修通过这种资本输出带动的商品输出获取大量的利润。第三，规定“援建”企业建成后，要拿生产的实物或其他廉价原料来偿还贷款，苏修又从压价收购中榨取差价。第四，向受“援”国派出大批苏修的“专家”、“顾问”，索取高额工资和津贴，无理要求享受种种特权，甚至打入受“援”国的要害经济部门，形成“影子内阁”，干涉内政，进行幕后操纵，并用各种手段排挤打击不满苏修的人。苏修的这种“援助”，简直是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四张皮来。不仅如此，苏修还以“国际分工”为名，力图把别国的重要经济部门纳入它的经济“计划”，使受“援”国的经济畸形发展，逐步加深对苏修的依赖，直到变成苏修的原料库和加工厂。

至于苏修的“军援”，更是赤裸裸地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经常吹嘘它的“军援”是什么“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性的鲜明例证”，其实，苏修的“军援”，完全是乘人之危，一面从推销过时武器中大发横财，一面



以“军援”为要挟手段，加紧对受“援”国的控制。谁接受了苏修的“军援”，第一，要高价买进，现金交易，外汇支付。逼得有的受“援”国不得不到欧洲金融市场去借苏修需要的美元。第二，苏修乘出售军火之机，套购受“援”国的重要原料，然后转手倒卖，牟取暴利。例如它在中东用军火换石油，再转口到欧洲市场上去高价出售，攫取几倍的超额利润。第三，苏修的军事“顾问”要控制受“援”国的军事指挥、供应和训练，受“援”国还要提供港口、基地的“使用权”等等。象这样的所谓“军援”，那里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气味，它是地地道道的苏修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鲜明例证”。七十年代初期，苏修的军火销售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军火商。

苏修在“经援”、“军援”之外，近来又积极效法资本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大搞对外直接投资。它在“经济合作”的外衣下，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搞了不少有关贸易、航运、银行、保险、维修、装配的所谓“合股企业”，并且公开要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垄断资本订立同盟，合伙在第三国开办企业。去年，苏修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公然要发展中国家“逐步地、分阶段地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由苏修在这些国家兴办“合股企业”，并且说这是“越来越坚定地提到首位”的“合作的新形式”。苏修津津乐道的这种“新形式”，说穿了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反映了苏修要加紧资本输出的新动向。

苏修在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的卑鄙手段中，与所谓“援助”居于同等重要地位的，还有所谓“平等互利”的贸易。这种贸易其实是不等价交换的代名词。苏修贱买贵卖的算盘，打得比资本帝国主义还“精明”。人所共知，现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关系，本来就是在帝国主义占垄断地位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本身就存在着不等价的交换，而苏修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价格，比当时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一般还要高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相反，它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商品价格，却比世界市场的价格还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这就等于在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再来一个不等价交换，这是不折不扣的双重不等价的剥削。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倾伏尔加河之水，也无法洗刷它国际奸商的肮脏嘴脸。

当年，列宁在揭露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手段时，就指出帝国主义既搞政治“兼并”，又搞经济“兼并”。所谓经济“兼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控制别国的铁路、矿山、土地等等，使一些国家负债，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于帝国主义国



家，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而这种经济“兼并”，并不破坏被“兼并”国家在形式上的政治独立。列宁说：“帝国主义列强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过去正是这样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由于民愤极大，名声太臭，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更隐蔽更狡猾的殖民主义新形式，诸如扶植傀儡，收买打手，组织军事、政治集团，利用“援助”作为控制的诱饵等等，推行新殖民主义。而苏修在“援助”的幌子下，对第三世界进行的经济渗透和控制，就是帝国主义经济“兼并”政策的新变种。

苏修之所以拚命地对外进行扩张和掠夺，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垄断是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今天在苏联当权的苏修叛徒集团，是一小撮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本身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利用窃取的国家机器，全面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融合，控制着苏联全国的经济命脉。它比资本帝国主义的私人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资本的集中程度更高，垄断性更强。

垄断资本的特性，就是要独占，要掠夺。国内的垄断资本统治，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和侵略。苏修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转嫁国内危机，维持其反动统治，便到处伸手，兴风作浪。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人肉筵席上，是一个迟到的角色，它所垂涎的许多主要原料和市场，都已被其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所占有，因此苏修和美帝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苏修不仅要剥削、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而且还要控制那些实力不如它的第二世界的国家。至于对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苏修则更是企图关起门来对那些“家庭”成员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苏修的所作所为，使人日益看清，被伟大十月革命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上台。他们借勃列日涅夫之身，还老沙皇之魂，妄图重续“太斯拉夫帝国”的迷梦，建立一个横跨欧、亚、非、拉的苏修大帝国。但是，“生于末世运偏消”。帝国主义制度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虽然野心很大，但



力量不够，它内在的虚弱本质和它的侵略政策所激起的种种矛盾，决定了苏修的野心终究是不能实现的。任凭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怎样挣扎，也决然改变不了它“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处境。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苏联也是纸老虎。**”大而虚，凶而弱，这就是苏修这个贪得无厌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本质。苏修貌似庞然大物，张牙舞爪，实际上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如今，苏联在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下，人民日益贫困，广大劳动群众已经成为丧失生产资料的雇佣奴隶，经常受到解雇和失业的威胁。由于苏修拚命推行“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更使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粮食发生困难；加之日益强化的法西斯统治和民族高压政策，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苏修为了转移人民视线，缓和阶级对抗和民族冲突，力图加紧对外扩张，结果就要进一步扩充军备、增加军费开支，促使财政恶化，经济失调，人民生活水平更加下降。

苏修越是加紧对外侵略扩张，它背上的包袱就越背越重，脖子上的绞索就越套越多，它的战线拉得越长，就越暴露出它的虚弱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从实践经验中越来越识破了苏修的真面目，要求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控制和掠夺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最近，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苏修装作要“承认”二百哩经济区的样子，企图继续推行海洋霸权主义的阴谋，遭到维护海洋资源主权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迎头痛击的事实，再一次反映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日益破产。受苏修控制、掠夺的第二世界一些国家和人民，反控制、反掠夺的斗争正在发展。苏修加紧对外扩张，和另一个超级大国到处争夺，使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美苏两霸之间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

苏修既然走着帝国主义的老路，它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帝国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冲突之中；它尽管横行霸道，到处乱窜，但是挖空心思也开不出挽救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任何药方。苏修越是声嘶力竭地沿街叫卖它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就恰恰说明它的处境孤立，日子很不好过。毛主席说：“**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第三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看穿了苏修新殖民主义的真面目。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谁是第三世界的真正盟友，谁是他们的敌人。第三世界团结反霸斗争的洪流，必将彻底摧毁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堆砌的堤坝，奔腾向前。

